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美] 詹姆斯·斯科特 著

王晓毅 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 (美) 斯科特著；
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
(学术前沿)
ISBN 978-7-108-05642-9

I. ①逃… II. ①斯… ②王… III. ①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史—
研究—东南亚 IV. ①D0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0799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5

字 数 375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5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学术前沿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创新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介绍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

如果说有历史的人群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那么也就可以说，没有历史的人群的历史就是他们反抗
国家的历史。

——皮埃尔·卡拉斯特(Pierre Clastres)：
《反抗国家的社会》(*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

目 录

前言	1
1 山地、谷地和国家	
关于费米亚的介绍	1
2 国家空间	
统治和征用的区域	49
3 人口和粮食的集中	
奴隶制和灌溉水稻	71
4 文明与化外之民	114
5 远离国家,进驻山地	152
6 逃避国家和防御国家	
逃离的文化和农业	216
6½ 口述、书写和文本	270
7 族群形成和进化	
一个激进的建构主义案例	294
8 复兴的先知们	351
9 结语	404
注释	422
译者后记	533

前 言

LX

赞米亚(*Zomia*)是一个新的名字,包括了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它横括了东南亚的5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4个省(云南、贵州、广西和部分四川)。其面积有250万平方公里,居住着1亿少数民族人口,他们的族群错综复杂,语言多种多样。地理上,赞米亚也被称为东南亚大陆山地。因为这个巨大的区域位于9个国家或地区的边缘,却不在任何一个的中心上,而且跨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地理区域(东南亚、东亚和南亚),此外令人感兴趣的还有它的生态多样性以及与国家的关系,正像阿巴拉契亚山区的跨国家研究一样,赞米亚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和一种新的地域研究思考方式。

我这本书的论点简单、有启发性而且容易引起争论。赞米亚是现存最大的地区,那里的人群尚未被完全纳入到民族国家中,它的历史屈指可数。虽然在不久前,大多数人类还都是这样自我管理的人群;今天,从谷地王国的角度,他们被看作“我们的活祖先”,“在有水稻种植、佛教和文明之前的我们”。与此相反,我主张最好把这些山地居民看作逃避者(*runaway*)、逃亡者(*fugitive*)或被放逐者(*maroon*),在过去2000多年中,他们成功逃避了谷地国家项目的压迫——奴役、

X

征募、赋税、劳役、瘟疫和战争。他们所居住的区域也许更适合被称为碎片区(*shatter zones*)或避难区。

实际上,和他们有关的一切:谋生手段、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甚至颇有争议的口头传承文化,都可以被认为是精心设计来远离国家的控制。他们分布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他们的流动性、耕作习惯和亲属结构,他们适应性极强的民族认同,以及他们对预言中千年领袖的热衷,这些都有效地帮助他们避免被统合入国家体制,也防止他们内部形成国家体制。他们大多数人要逃避的国家就是早已成形的中国王朝。逃避的历史可见于许多山地传说。尽管公元1500年以前的资料还有些推测成分,但这之后的文献足够清楚,包括明清时期政府经常发动针对山民的战争,以及19世纪中期中国西南地区规模空前的起义高潮,导致数百万人寻求避难所。此外关于逃避缅甸和泰国国家发动的劫掠奴隶的行为记载也同样丰富。

尽管赞米亚所横贯的亚洲范围已很广阔,但我希望我的观点能在这之外引起共鸣。

无论是当代或历史上,大量有关国家形成的文献都不曾注意到它的另一面:蓄意和反应性的无国家历史。这是一个逃避者的历史,离开了逃避者的历史也就无法理解国家的形成。正是他们造就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

在国家形成和非自由劳动力体制中,许多人群的历史被排斥在外,包括吉卜赛人、哥萨克人、新世界中由逃避西班牙殖民归化区(*reducciones*)统治的人所形成的多语言混杂部族、菲律宾人、逃奴群体、沼泽阿拉伯人(*Marsh Arabs*)、西南非洲的游牧民族(*San-Bushmen*)等。在这本书中,这些历史也被涵盖。

我的论点推翻了那些被广为接受的有关“原始主义”的论调。草原畜牧业、觅食、轮耕和裂变宗族制(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经常是“次级适应”，一种人们采取的“自我野蛮化”(self-barbarianization)。采取“自我野蛮化”人群的地点、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都适合于逃避国家管理。对于那些生存于国家管制下的人们来说，这样的逃避与山地中派生、模仿和寄生的国家形态是一致的。

我的观点要解构文明历史中关于“野蛮”、“生”和“原始”的论述。近一步的观察发现，这些词汇实际意味着“未被统治”和“尚未被纳入国家体制”。在有关文明的论述中从来不考虑人们可能会自愿走入野蛮，因此这些状态被谴责和认作非正统。赋税和主权国家覆盖之外恰恰就是少数民族或“部落”开始的地方——在罗马帝国和中国都同样如此。

XI

生存形式和血缘关系往往被认为是先天赋予的，由生态和文化所决定的。但是通过分析不同耕作形式、作物种类、特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人员流动特点所蕴含的逃避价值，我宁愿相信这些所谓的“先天赋予”主要是政治选择的结果。

山区成为包括游击队在内的逃避国家人群的庇护所，这是一个重要的地理话题。我发展了“地形阻力”(friction of terrain)的概念，这为理解前现代社会中国家形成的政治空间和困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对这本书我是唯一该负责的人，我是作者。在我开始道歉和对一些批评进行预先回应(我知道是徒劳)之前，让我们先把这个说清楚。我可以预见到这些批评正向我压来，甚至在我写这句话的时候。

我经常被指责为是错误的,但很少被指责为含糊不清或晦涩难懂。这本书也不例外。不可否认,我对于东南亚大陆的山民所持的主张是非常大胆的,但是我相信,也许会有细节上的错误,总体来说我的主张是正确的。当然,对错的判断并不由我掌握,而是读者和评论人。但是对于书中的主张,这里我要强调三点:第一,这里没有原创的内容。就是说,这本书中的任何一个想法都不是来自于我。我所做的只是从我仔细阅读过的大量文献中看出了一种内在的规律和观点,把这个观点提炼出来,看它能把我带到哪里。如果有任何有创造性的地方,那就是理解这种格式塔式整体形态的存在并将其融会贯通。我知道我引用的许多观点和推测,它们的原创者可能会认为我走得太远了,有些人已经告诉了我,其他人好在不大抱怨了。我在他们的意见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他们无须负责,正像别人如何使用这本书内的观点与我无关。

XII 我有些吃惊地发现我已经差不多成为历史学家——尽管不是特别好的,但的确是历史学家。而且是个老历史学家,老的两个含义都适用。我熟知历史学家的职业病,比如他们可能准备写作18世纪历史,但结果大多却写的是17世纪的事情,因为这对要讨论的问题极为重要。我也毫不例外。我在阅读有关山民的民族志和缅甸军队在少数民族地区侵犯人权的报告时,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为古代曼陀罗(mandala)*王国运用强制手段的建国过程所吸引。我在有关东南亚的前殖民和殖民时代的研究成果要归功于两门不同的研究生阅读课。一

* 曼陀罗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圆圈,佛教的艺术中经常采取圆形的方式。曼陀罗国家往往指中心权力向周边扩散的国家形式。——译者注

门是阅读有关东南亚研究的基本教科书,就像是知识分子的新兵训练营,我们读的都是这方面的基础著作,也就是那些多数学者书架上有但却不好意思承认没读过的书。最开始的著作是两卷本的《剑桥东南亚史》,让我们耳目一新。第二门课是关于缅甸的,也是从基础读物开始。

由此引出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我在这本书中所说的一切对“二战”以后的时期不适用。从1945年开始,或者甚至更早,国家动用消除距离的技术的能力,这些技术——包括铁路、全天候公路、电话、电报、空中战斗力、直升机,以及现在的信息技术——已经打破了那些自我管理的人民与民族国家之间权力的战略平衡,地形的阻力在减少,因此我的分析也基本没有用了。与此相反,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现在忙于把其权力伸展到最远的边界,将那些弱者或尚未被统治的区域清扫收编。由于需要“部落区域”的自然资源,和希望保障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生产能力,促使各地形成了“吞并”的战略,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被认为忠诚并渴求土地的谷地居民被移居到山地。如果我的分析不适用于20世纪后期的东南亚,别说我没早警告你们。

最后,我担心这里描述的有关种族形成的激进建构主义个案会被误解,被当成是在贬低甚至诋毁那些勇敢的人们为之奋斗和牺牲的民族认同。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无一例外,所有的认同都经由社会建构:不论是汉人,还是缅甸人、美洲人或丹麦人。这些认同,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认同,经常首先是由强有力的国家构造的,比如英国殖民者造出了克伦族(the Karen)和掸族(the Shan),法国人制造了加莱族(the Jarai)。不管是被生造还是被强加的,这些民族都选择了某种特性作

为自己的理想,尽管有些特性比较模糊,这包括宗教、语言、肤色、饮食,以及生存的意义。这些分类,一旦通过疆域、土地所有权、法庭、习惯法、指定的领袖、学校和文字被制度化,都可能成为强烈且充满活力的认同。如果这种认同为更大的国家和社会所诋毁,反而更容易促使形成抵抗和挑战的认同。这样构造出来的认同与自我奋斗的英雄主义相结合,从而使得认同成为一种荣誉。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具霸权的政治单元,因此毫不奇怪,这些自我确认的过程往往采取排斥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形式。因此对于那些甘冒一切风险谋求某种形式的独立和认可的掸族人、克伦人、钦族人(the Chin)、孟族人(the Mon)、克耶人(the Kayah),我满怀敬慕。

我在知识上至少从五位“死去的白人”中学到很多——将来我也会加入他们。他们是先行者,我沿着他们的道路蹒跚到这里;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无法发现这条路。最早的一位是皮埃尔·卡拉斯特(Pierre Clastres),他在《反抗国家的社会》(*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中对南美洲被征服以后逃避国家(state-evading)和抵制国家(state-preventing)的本土居民所做的大胆解释被后来的资料证明是很有洞察力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对汉族中国和边缘地区游牧民族之间关系的透彻的远见卓识帮助我看到,在中国西南边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关于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Berber-Arab)之间关系的分析使我了解到,君权和税收无法到达的地方就是“族群”和“部落”的空间。所谓的“野蛮人”(barbarian)是国家描述那些自主治理、尚未臣服的人民所用的词汇。任何走我所走的这条路的人都要靠

不断地参阅爱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的《缅甸高地的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才能有所成就。很少有著作这么“值得深入思考的”。最后我要感谢詹姆斯·G. 斯科特(James G. Scott),即施韦·尤义(Shwe Yoe),他身兼军队的将领、殖民地的官员,《上缅甸志》(*Gazetteer of Upper Burma*)的编纂者和《缅甸人》(*The Burman*)的作者诸种身份。我们不是亲戚,但是因为我从他敏锐的观察中受益匪浅,而且按照缅甸星象学的测算,我们应该有同样的缅甸名字,所以我也采用了他的缅甸名字以取悦他的神灵。

那些强烈质疑自命的统治者如何来教化边缘人群的论述,以及重新审视边缘人之所以会被边缘化的著作激励并指导了我的研究。贡萨洛·阿吉雷·贝尔特兰(Gonzalo Aguirre Beltrán)30年前出版的经典小书《避难的地区》(*Regions of Refuge*)对拉丁美洲大陆的研究相比卡拉斯特得出了更普遍的结论,而斯图尔特·施瓦茨(Stuart Schwartz)和弗兰克·所罗门(Salomon)又更加深入细致地考察和阐明了这一结论。与我所关注的地理区域接近,罗伯特·赫夫纳(Robert Hefner)关于爪哇腾格里高地(Tengger Highlands)和乔弗瑞·本杰明(Geoffrey Benjamin)对马来西亚的原住民(*orang asli*)的研究都是极具说服力的杰出案例,他们鼓励我用类似的观点去看赞米亚。

XIV

赞米亚的概念要完全归功于威利姆·范·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他预见到这样一块向西延伸到印度的巨大高地边界区(在他的看法中甚至更大)具有鲜明的特色,应该成为一个有特定称谓的研究对象。在陈述“赞米亚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必要性时,他质疑了传统的地区(area)或区域

(region)的概念。我读了他关于这个词令人信服的议论后,立即报名成为拥护赞米亚军队(心理战争分支)的一员。威利姆、我,还有其他几位同事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召集第一届国际赞米亚研究大会。范·申德尔关于孟加拉边境地区的研究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表明如果我们真正听取他的指导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如果有耐心,或者想做一个更为综合全面的研究,那么至少应该再包括一章讨论江河湖泊中的避难所。我只是顺带提及他们,却遗憾地没能好好地讨论他们。如同山上流动的居民一样,东南亚海岛中人数众多的水上游民(*orang laut*,海上游牧民,海上吉卜赛)也是在海岛中不断航行,居无定所。如同许多山民一样,他们也有尚武的传统,可以很容易地从抢掠海上的运输船和掠夺奴隶,变为马来王国的海上警卫或水军。他们位于主要水上通道附近,可以迅速地进攻然后消失,形成了一个水上的赞米亚,这应该在我的分析中占有一席之地。正像本·安德森(Ben Anderson)在鼓励我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研究时所说的,“海洋的面积更大,比山地和森林更广阔。可以看到现在的海盗仍然可以沉着轻松地躲避开七国集团和新加坡等的围剿。”但是有目共睹,这本书已经太厚了,而且我必须将这个主题留给更有能力的人去继续:埃瑞克·塔格里亚克左(Eric Tagliacozzo)已经出色地开始了这一工作。

有四位学者的研究兴趣与我完全吻合,如果没有他们,这本书的完成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因为雷曼(F. K. Lehman)·漆莱(Chit Hlaing)和理查德·奥康纳(Richard O' Connor)文章

品。维克特·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一位从事东南亚国家建设比较研究的一流的历史学家,和早于我们就高举赞米亚(或如他自己所称的东南亚丘陵地区)旗帜的让·米肖(Jean Michaud)则是主要的对话者。所有这四位学者都展现了高度恢宏的知识境界(intellectual largespiritedness),特别是他们与我意见不同的时候。他们可能不尽同意我在本书中所说的,但他们应该知道,正是他们使我更聪明,尽管可能还没达到他们的期望。此外,我还要感谢让·米肖慷慨地允许我使用《东南亚丘陵地区居民历史词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Peopl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Massif*)中的许多段落来作我的术语表。

有许多人阅读了部分或全部的书稿并坦率地给我提出了建议,尽管这占用了他们做其他更好事情的时间。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讨论变得更细致和严密。下面的名单不分先后:迈克尔·艾达思(Michael Adas),阿吉·斯卡瑞亚(Ajay Skaria),拉玛昌德·古哈(Ramachandra Guha),塔尼亚·李(Tania Li),本·安德森(Ben Anderson),迈克尔·昂-特文(Michael Aung-Thwin),今村正雄(Masao Imamura),还有历史学家U. 它·屯·毛昂(U Tha Htun Maung)和U. 索易·科尧·图(U Soe Kyaw Thu),考古学家U. 屯·登(U Tun Thein),地理学家亚瑟·皮(Arthur Pe),乔弗瑞·本杰明(Geoffrey Benjamin),珊珊·杜(Shan-shan Du),曼迪·萨丹(Mandy Sadan),迈克尔·哈撒韦(Michael Hathaway),瓦尔特·科瓦德(Walt Cowand),本·科克里克特(Ben Kerkvliet),朗·赫林(Ron Herring),英德拉尼·查特杰(Indrani Chatterjee),钦·毛昂·温(Khin Maung Win),迈

克尔·多芙(Michael Dove),詹姆士·哈根(James Hagen),简-巴特·基瓦尔德(Jan-Bart Gewald),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颂差·文尼查克(Thongchai Winichakul),凯瑟琳·鲍威(Katherine Bowie),本·基尔南(Ben Kiernan),帕米拉·麦克艾尔威(Pamela McElwee),南斯·卡宁汉姆(Nance Cunningham),昂·昂(Aung Aung),大卫·鲁登(David Ludden),雷奥·卢卡森(Leo Lucassen),珍妮思·斯图加特(Janice Stargardt),托尼·德(Tony Day),比尔·克劳斯纳(Bill Klausner),米亚·丹(Myra Than),苏珊·奥多诺万(Susan O'Donovan),安东尼·雷德(Anthony Reid),马丁·克莱(Martin Klein),裘·古尔第(Jo Guldi),亚顿·毛昂·萨格梦(Ardeth Maung Thawngmung),波·波·聂(Bo Bo Nge),马思中(Magnus Fiskesjö),玛丽·卡拉汉(Mary Callahan),恩里克·梅尔(Enrique Mayer),安其里克·豪格吕(Angelique Haugerud),迈克尔·麦戈文(Michael McGovern),吴丹敏(Thant Myint U),马克·爱德曼(Marc Edelman),凯文·海普纳(Kevin Heppner),克里斯汀·仑茨(Christian Lentz),金安平(Annping Chin),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杰夫·韦德(Geoff Wade),查尔斯·凯斯(Charles Keyes),安德鲁·特顿(Andrew Turton),石川伸(Noburu Ishikawa),克农·卜利兹勒(Kennon Breazeale),以及凯伦·巴克(Karen Barkey)等等!我在这个名单中还隐去了四个同事的名字,他们没有给我意见。你们自己知道都是谁。该不好意思吧!当然如果你们体力不支无法把手稿从打印机搬到桌子上,请接受我的歉意。

我还想感谢几位同行的帮助。郝力菲尔·强森(Hjorleifur Jonsson)的《绵的关系》(*Mien Relation*)是一部见解独特的

著作,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想法,特别是有关山地居民认同和社会结构韧性的论述。迈克·格力弗斯(Mikael Gravers)教会了我很多有关克伦族人以及他们笃信的千禧年世界观的基础。埃瑞克·塔格里亚克左(Eric Tagliacozzo)无比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手稿,并且为我制定了一个阅读计划,我现在仍在努力完成。最后,我还从五位同事那里受益良多,多年前我和他们一起开始研究“本土和官方的认同”,他们是:彼得·萨林斯(Peter Sahlins),平克尧·朗格马斯瑞(Pingkaew Luanggaramsri),万科丸·步戴(Kwanchewan Buadaeng),楚萨卡·威特雅帕(Chusak Wittayapak),此外还有珍妮·司徒珍(Janet Sturgeon),早在有赞米亚这个词汇出现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实践中的赞米亚研究者(Zomianist)。

在1996年,我的同事萧凤霞(Helen Siu)说服我作为讨论人参加一个中国边界和边民的研讨会。由她、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和科大卫(David Faure)组织的这个研讨会非常引人深思和充满生气,由此产生的许多想法都可以在这本书中看到。这个研讨会所形成的由柯娇燕、萧凤霞和苏堂棣(Donald Sutton)编辑的《边缘的帝国:现代中国早期的文化、种族和边疆》(*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集合了原创的历史、理论和民族志。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找到我的方向是如此迟缓,但是有许多机构收留并支持了我。我在帕罗奥多(Palo Alto)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开始阅读东南亚高地的背景资料和有关国家与流动人口关系的资料,在那里,阿历克斯·凯萨(Alex Keyssar)、

南希·科特(Nancy Cott)、托尼·贝宾顿(Tony Bebbington)和丹·西格尔(Dan Segal)都是我的良师益友。这种阅读持续到2001年春我在奥斯陆发展与环境中心,在那里,德斯曼德·麦克尼尔(Desmond McNeill)、西格纳·哈维尔(Signe Howell)、尼娜·维特泽克(Nina Witoczek)和贝昂特·哈格威特(Bernt Hagvet)的知识和魅力都使我受益匪浅。在钦·毛昂·温宽容的关注下,我认真地跟随缅甸民主之声电台学习缅甸语。在罗斯基勒大学(Roskilde University)国际发展研究生院社会与全球化系的时候,我完成了这部书的第一稿。我想记录我对克里斯汀·隆德(Christian Lund)、普雷本·卡索尔姆(Prebek Kaarsholm)、鲍迪尔·佛尔克·弗里德里克森(Bodil Folke Frederiksen)、因格·詹森(Inge Jensen),以及奥雷·布伦(Ole Brun)的感谢,他们给予我精神上的鼓舞,并使我的访问非常愉快。

XVII 在过去的20年中,我的知识支柱主要来自于耶鲁大学的农业研究项目。土地改革的支持者(agraristas)、学者、演讲人、研究生和我在教学中的同事不断地给我以信心,使这个项目成为一个知识的聚会所,既欢乐又充满挑战,既友好又很艰苦。凯·曼斯菲尔德(Kay Mansfield)自始至终是这个项目的核心和灵魂,像指南针一样确定我们的方向。我的同事K. 希瓦拉马克日什南(K. Sivaramakrishnan,又名Shivi)、埃里克·沃比(Eric Worby)、罗伯特·哈莫斯(Robert Harms)、亚伦·阿格拉瓦尔(Arun Agrawal)、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eedman)、琳达-安娜·雷布汉(Linda-Anne Rebhun)和迈克尔·多芙(Michael Dove)在我的持续学习中都伸出了慷慨的援助之手。在他们之中,迈克尔·多芙和哈罗德·康

克林(Harold Conklin)教会了我所有关于火耕(swidden cultivation)的知识,这在分析中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几位主动且出色的研究助理,他们帮我节省了数月的无效劳动并避免了许多错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以自己的成绩被世人所知。阿拉什·卡责尼(Arash Khazeni)、沙夫卡特·胡赛因(Shafqat Hussein)、奥斯汀·泽德曼(Austin Zeiderman)、亚历山大·李(Alexander Lee)、凯蒂·沙弗(Katie Scharf)和凯特·哈里森(Kate Harrison)帮助我将这个计划变为切实可行。

那些见证我与缅甸语斗争的缅甸朋友至少应该得到高危工作补助,也许应该被称为圣人,或者在小乘佛教背景下,应该是天神(deva-hood)。我要感谢萨亚·钦·毛昂·吉(Saya Khin Maung Gyi),他是我时间最长、最久经磨炼和最耐心的教师,还有他的全家,包括桑·桑·琳(San San Lin)。莱特·莱特·昂(Let Let Aung,又名薇奥拉·吴[Viola Wu])、波·波·聂(Bo Bo Nge)、卡鲁·鲍(Kalu Paw)和钦·毛昂·温(Khin Maung Win)勇敢地忍受着我慢得难受且奇怪的谈话。康·科尧(Kaung Kyaw)和考·索易·科尧·图(Ko Soe Kyaw Thu)尽管不是正式的教师,但是作为朋友帮助并督促我。最后,萨亚·拿英·屯·琳(Saya Naing Tun Lin),一位天生的老师,当我在曼德勒(Mandalay)和其他地方旅行的时候,他发明了一种适合我这种普通人的教学方法,并且严格地执行。我们经常在小旅店宽敞的四层阳台上课。当我四五次都发错同一音调或发音时,他就会突然站起来,走到阳台的边上。我几次都担心他会因失望从阳台上跳下去。当然他没有。相反,他会走回来,坐下,深吸一口气,然后重新开始。如果没有他,我根本

无法坚持下来。

我在想给这本书取什么名字时，一位朋友告诉我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政治学家吉米·卡萨斯·克劳森(Jimmy Casas Klausen)正在讲一门政治哲学课，题目就是“逃避统治的艺术”。克劳森慷慨地同意我使用它作为我的书名，对此我非常感谢。我等待某一天他在这方面出版一本自己的著作，为这个事业建立哲学地位。

斯特林图书馆耶鲁地图中心(Yale Map Collection of Sterling Library)的斯塔西·梅普尔(Stacey Maples)以其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制作了书中的地图。他把我对东南亚国家统治空间问题的理解用图形绘制表现了出来。*

XV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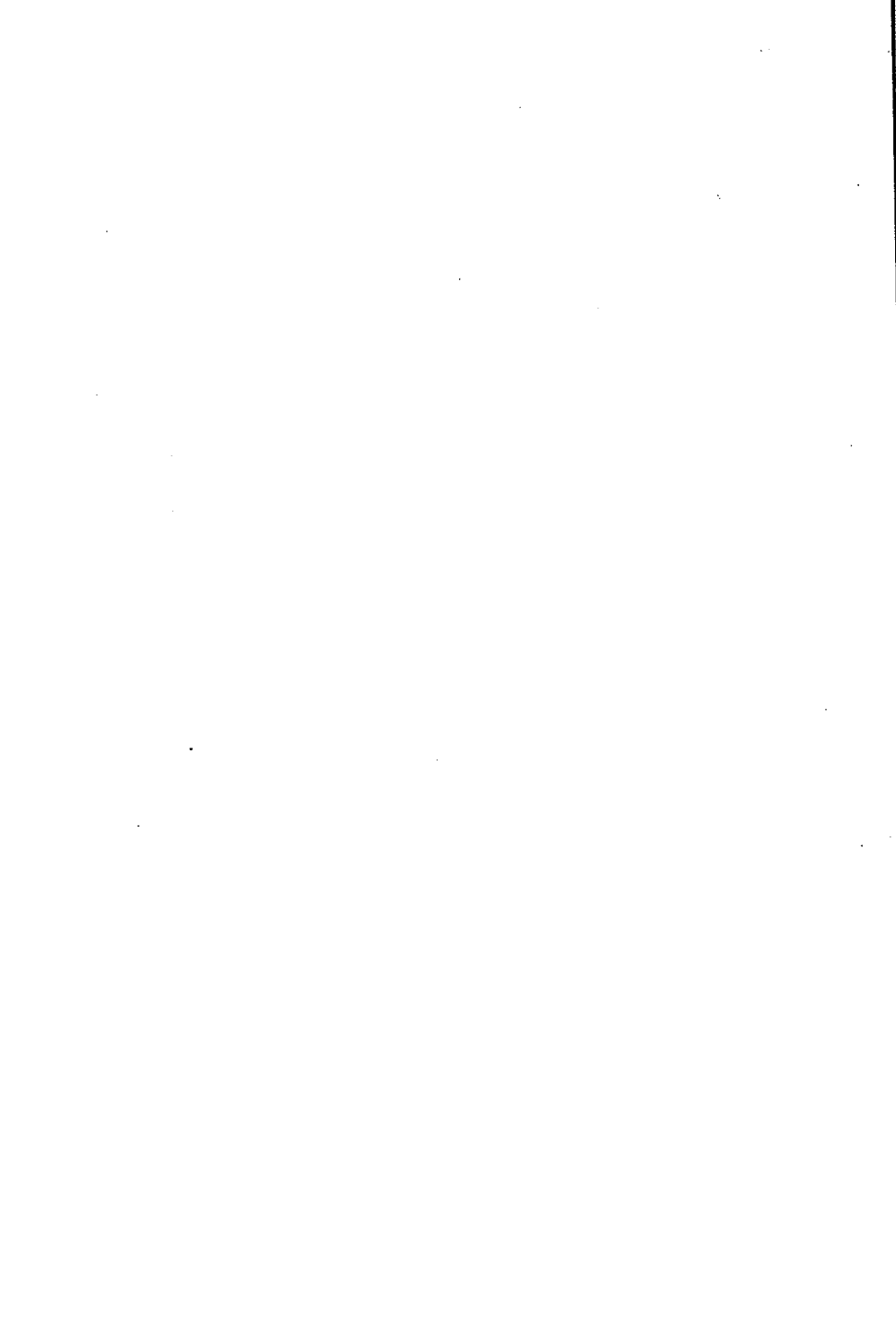
在适当的地方，我加进了一些缅甸语的词汇或短语。从缅甸语字母转换成罗马字母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体系，我采取了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约翰·欧凯瑞(John Okell)所发明的系统。在他的《缅甸语：口语导论》(*Burmes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oken Language*)第一卷(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4)中解释了这个系统。为了避免误解，我在重要的地方加上了缅甸语原文。

我不可能为这本书，以及这套丛书中的其他著作，找到比让·汤普森·布莱克(Jean Thomson Black)更合作和有才华的编辑，耶鲁大学出版社也不可能找到比他更优秀的编辑了。他也编辑了农业研究丛书中的其他著作。我的手稿编辑丹·西顿(Dan Heaton)在尊重原文的情况下对手稿中的错误

* 由于版权及其他原因，中译版略去了这些地图。——出版者注

和冗言作了严格的修改,从而使呈现给读者的这部作品有了很大改进。

最后但绝非不重要,没有我至高女神的远见卓识和陪伴,我不可能完成这部书稿的写作。



1 山地、谷地和国家

1

关于赞米亚的介绍

在本书的开始,我将引用三个充满挫败的具有诊断意义的叙述,前两个来自于即将开始进行征服的官员,他们将要征服那些桀骜不驯的景观与那里不断逃亡和反抗的居民。第三个则来自于另外一个大陆,这是一个即将开始的精神征服者,他失望于那个景观所鼓励的反宗教和异端邪说。

制作地图是困难的,制作贵州省的地图尤其如此……贵州南部的土地支离破碎且边界不清……一个地区或县可能被分裂成许多小块,还经常被其他地区或县分隔……另外还有苗族和汉族人混居的无主土地……

贵州南部有众多山峰汇集。它们纠结在一起,没有平原或沼泽将山地隔开,也没有大小河流限制它们,四处都是山,几乎看不出什么走向。……山地的居民很少,一般山峰也没有名字,要想清楚地描述山的形状是很困难的,山脊和山峰似乎没有区别。要想叙述山脉的格局就不得不出详细的叙述。有时候要描述数公里长的分支山系就不得不需要一堆文献,或者为了讲清一天的主要行程,就要写几章书稿。

1

地方方言也很让人迷惑，50公里的空间内，一条河可能有50个不同的名字，一块方圆1.5公里的营地可能有3个不同的名字。这里的命名方法就这样靠不住。¹

2

那些崎岖不平并长满丛林的地带是长期被土匪占据的地方。地处敏布县(Minbu)和德耶县(Thayetmyo)之间，在掸山(Shan Hills)、阿拉坎(Arakan)山和钦(Chin)山脚下的沼泽低地带(terai)就是这样。在这里追踪是不可能的。这个地带狭窄、曲折，特别适合打伏击。除了通常使用的道路外，很少有其他方法进入；对于我们的队伍来说，丛林疟疾是致命的；纵队只能通过丛林前进。村庄很小而且很分散，每个村庄都很紧凑，经常被无法穿过的茂密丛林所包围，那些小路或者只能容下一辆推车通过，或者更窄，通过丛林时有许多悬垂荆棘和多刺的爬藤植物。大量的干草会在三月被焚烧，但是一旦重新开始降雨，又会变得完全无法通行。²

地面被弯曲的小溪冲刷成许多小的沟壑。小溪众多，一个面积仅373平方英里的县地形图上有339条有名字的小河，也就是说每10平方英里就有9条小河，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多数的山谷都呈V字形，沿河岸能够建房或作小菜园的平地很少。……缓慢且困难的交通方式带来的地理隔绝又被其他一些因素所加剧。比如道路经常是迂回的，旅行经常是沿着一条河向下走，又沿着另外一条河向上走，或者沿着河流上到分水岭，然后沿着山脊的另一侧的河流向下。经常出现因为交通不便，出嫁的女儿

十多年没有回家看望父母,尽管相距不超过10英里。³

在每一声悲叹后面都隐藏了特定的统治行动:清朝的统治,帝国时代的英国人统治,以及阿巴拉契亚正统新教的统治。他们都不自觉地把自已设计成秩序、进步、启蒙和文明的承载者。他们都希望伴随着国家和有组织的宗教,将行政管理的益处推广到原来不曾被统治的区域。

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理解这些统治行动及其代理人与那些相对自主的区域及其居民之间充满辩证的关系?在东南亚大陆,这些关系特别引人注目,造成了这一区域最重要的社会对立,并塑造了这一区域的历史:山地居民与谷地居民之间,或者上游居民(马来语称为*hulu*)与下游居民(*hilir*)之间的关系。⁴我相信,仔细地追溯这种辩证关系也就是在追溯我们是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全球的谷地国家形成,以及人们向山地迁移的过程。

扩张的国家与自我治理的人民之间的遭遇并不仅仅限于东南亚,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内部殖民化”是一个重要特征,不仅反映在文化上,而且反映在行政管理上;在罗马帝国、哈布斯堡、奥斯曼、中国王朝和英国的帝国事业中,在美国、加拿大、南非和阿尔及利亚的白人殖民地上本土人被征服过程中,在贯穿中东历史的城镇定居阿拉伯人与游牧民的辩证关系中,都可以看到这种遭遇。⁵就像生鲜食物与经过烹饪的食物,野生动物与驯养的动物,山地/林区的居民与谷地/开阔地的居民,上游与下游的居民,野蛮的与文明的,落后的与现代的,自由的与被束缚的,有历史的人民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在不同的地方,遭遇的形式是不同的,但是自我治

3

理的人民与国家统治的人民之间的遭遇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普遍性为我们提供了多种比较的可能性。我们将充分利用这些机会进行比较。

一个边陲的世界

在有文字记载中,也就是说从谷物种植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开始,我们所考察的这种遭遇就是统治者一直在关注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透镜拉回到过去,看问题视角更广一些,从人类的历史,而不是从国家—文明的历史去观察,就会令人惊奇地发现,这种遭遇只是不久前刚刚发生的事情。现代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生存在大约20万年前,而在东南亚最多只有6万年。在这个地方,最早出现少量定居人口聚集不会早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这只是历史景观的一个点——局部、微弱和短暂的。在公元元年前不久,也就是人类历史的最后1%的时间内,社会景观是由初级的自我管理的血缘群体构成的,在打猎、宴请、冲突、贸易和媾和中,这些血缘群体可能会暂时地进行合作。那里不存在所谓的国家。⁶换句话说,没有国家结构的生存是普遍状况。

4 农业国家的产生使国家统治下的定居者与边陲地区的化外之民,或事实上处于自治状态的人群之间有了明显的区别,并进而产生了相互影响的关系。至少到19世纪前期,甚至对于那些最有野心的国家来说,其统治范围也受到了交通困难、军事技术水平,特别是地理条件的限制。1600年东南亚的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5.5人(印度和中国达到了差

不多35人),被统治者很容易进入到面积广阔、土地充足的边陲地带。⁷边陲地带像一个没有开发的稳定平衡装置,国家越是压榨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就越少。边陲地带保障了大众的自由。理查德·奥康纳(Richard O' Connor)很好地把握了这种辩证关系:“一旦国家出现,至少对于农民来说,适应的环境重新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移动可以使他们逃避国家的强制负担以及战争。我称这为第三种逃散(tertiary dispersion)。另外的两种变革——农业和复杂社会——是稳定可靠的,但是国家对农民社会的统治却不然,并且我们因而发现了‘会聚人口……和建立村庄的战略’。”⁸

最后的圈地

不管是在殖民地或在所谓的独立国,只有现代国家有资源真正实施他们的统治方案,也就是将非国家的空间和人口都置于自己的脚下,这在前殖民地时代只能是个幻想。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个方案代表了东南亚最后的大规模圈地运动。至少在20世纪,这一运动被持续进行,尽管并不顺利且时有挫折。不管是殖民地或独立国家,集权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或独裁主义,所有政府都曾热切地投身这一方案。各种统治者都不顾一切地追求这一目标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这种行政、经济和文化标准化的方案深深植根于现代国家的结构中。

从国家中心的角度看,这一圈地运动可以被看作整合边陲地区人口、土地和资源,使他们为国家创造收入的尝试。如

果用个法文词来说,是把他们变成“可收益的”(rentable)——对国民生产总值和外贸有可见贡献的人。事实上,边陲各民族与低地(lowland)和世界贸易有着稳定的经济联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商业中的大多数有价值产品似乎都是他们提供的。虽然把他们彻底统合进来被从文化上看作发展、经济进步、消除文盲和社会整合。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圈地运动的目标可能更多的是使他们的经济活动成为可见、可征税、可估价和可征用的,而不是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就会迫使他们采取可以达到这些目标的生产方式。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国家已经强迫移动的游耕民在固定的村庄中定居下来。他们试图用封闭的公共产权(closed common property),包括集体农场,特别是自由经济下的个人永久业权(freehold),代替开放的土地公共产权(open common-property)。他们已经将木材和矿业资源控制为国家资产(national patrimony)。只要可能,他们就鼓励用种植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园式农业取代原有普遍种植多种作物的耕作方式。“圈地运动”这个词用在这里恰如其分,这几乎是1761年以后英国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圈地运动的翻版,结果一半的英国公共耕地被侵吞以支持大型私有的商业化生产。

如果我们从最广泛的历史角度去看,大规模圈地运动的与众不同和革命的一面是很明显的。在最早的中国和埃及,以及后来的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印度、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人口数量都不多。它们所占据的地区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其臣民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东南亚大陆,第一个国家是在5、6世纪才出现的,在历史书籍中它们占有很大篇幅,但是它们对其地域和人民的影响都

很小。这些小的统治权力中心由护城河和城墙围绕,周边是一些为其纳贡的小村庄。这些权力等级上的小节点是不稳定和地域狭小的。在那些尚未被考古遗址和国家中心的历史所迷惑的人眼中,景观完全属于边陲地区,没有中心。几乎所有的人口都在统治中心的范围之外。

尽管这些国家中心很小,但它们具有杰出策略和军事优势,有能力将人力和食物集中在一起。在固定农田中的灌溉稻作农业是其关键。⁹作为新的政治形式,稻作国家只是将原来无国家的人民集中在一起。一些臣民无疑被贸易、财富机会和宫廷中心所提供的社会地位吸引,但其他的人,而且肯定是大多数人,则是战场上俘获或从奴隶贩子手里买来的战俘或奴隶。这些小国的所谓“野蛮边陲”至少从两个角度上看是关键的资源。首先,它是稻作国家赖以繁荣的许多重要贸易物资和林产品的来源。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贸易物资,即由俘虏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来源,人力是任何成功的国家都需要的。我们所了解的古典国家,如埃及、希腊和罗马,以及早期的高棉、泰国和缅甸,其臣民多是不自由的奴隶、俘虏,以及他们的后代。

6

围绕着这些小国有很多尚未被统治的边陲地带,这构成了挑战和威胁。它们是逃亡者和不断迁移人的家园,这些人的生存方式,包括采集、狩猎、轮耕、打鱼和放牧,使国家很难向他们征收赋税。他们生计的多样性、易变性和移动性意味着,对于与定居农业相适应的农业国家来说,这些尚未被统治的景观及其人民是财政收入的贫瘠之地。再者,除非他们愿意从事贸易,否则他们的生产活动因为下面的原因而难以接近。各地早期国家几乎都是可耕作的平原或高原的产物,从国家的角度看,大量尚未被统治的人口则处于边远难以到达

的区域：山区、泥地、沼泽、干旱草原和沙漠。即使有些时候他们的产品从理论上说也可能被政府征用，但由于位置分散和交通的困难，他们成功地居于统治之外。两个区域之间在生态上是互补的，是天然的贸易伙伴，但是贸易很少是被迫的，而往往采取自愿交换的方式。

对于早期国家的精英来说，那些经常被看作“野蛮部落”的边陲地区也是潜在的威胁。像蒙古人和匈族(Huns)人，奥斯曼和他的征服队伍那样，武装起来的游牧民族或者占领并摧毁国家，或取而代之，这类事情尽管很少发生，但是让人印象深刻。比较经常出现的是，那些不被国家统治的人民发现抢劫那些从属于国家的农业社区定居点更容易，他们有时也会像国家一样系统地征收贡金。国家为了“容易征收”而鼓励定居农业，抢劫者也发现定居点是很好的征收贡金的地方。

尚未被统治的边陲地区之所以成为主要而持续的威胁在于它对国家之内的人形成了持续的诱惑，构成一种可选择的替代生活。一个新国家的建立者往往从前任的占据者那里夺取耕地，原有的居民或被统合，或选择离开。也许可以说那些选择离开的人是第一批逃离国家权力的难民，他们加入到国家统治区域之外的人群中。当国家范围不断扩大时，其他人也会面临同样的两难境地。

7 当国家弥漫在所有地方，无可逃避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记，历史上有很长时期人们可以选择生活在国家之内或之外，或者在中间地带，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也可以改变其生活区域。一个富裕且和平的国家中心可能吸引越来越多认识其利益的人。这当然符合标准和文明的叙述，在这种叙述中，粗鲁的野蛮人为国王的和平和公正所带来的富饶所诱惑。世界上

多数的拯救宗教中都有类似的叙述,当然也包括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这样的叙述忽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我们已经注意到,早期国家的许多人口,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都是不自由的,他们是被强制的臣民。第二个事实就是国家的臣民经常逃离,这看来与标准的有关文明的叙述很难相容。从定义上就可以知道,居住于国家之中意味着赋税、征募、徭役,以及多数情况下的被奴役状态,这种状态构成国家战略和军事优势的核心。一旦这些负担变得过于沉重,臣民立即会迁移到边陲地区或其他国家。在前现代化条件下,拥挤的人口、驯养的牲畜、高度依赖单一粮食作物对人类和作物的健康都产生了影响,饥荒和传染病很容易发生。最终,早期国家成为战争机器,同时,它又导致臣民因为逃避征募、入侵和抢劫而外流。因此,早期国家挤出和吸引人口都很快,而且经常在国家因战争、干旱、瘟疫和伴随王位传承所导致的国内战争而崩溃的时候,其人口也会大量外流。国家并非建立以后就长久不衰,大量有关国家中心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国家都曾短暂地繁荣,接下来因战争、瘟疫、饥荒或生态崩溃而衰败,国家的历史有兴有衰,不可能一直持续。在长期历史上,人民不断进入或离开国家,“国家性”(stateness)本身就是循环和可逆的。¹⁰

在长期的国家建立和灭亡的过程中产生了边陲地区,那里是由从国家逃离出去的人和那些从未被国家统治的人所构成的。许多国家的边陲区域都成为避难所或者碎裂带(shatter zone),在那里,国家构成和国家间斗争中逃离的人群一点点聚集起来,形成了让人眼花缭乱、语言和族群都很复杂的地区。国家的扩张和覆灭还有一个齿轮效应,逃亡的臣民会迫使他们

前面的人群向前寻找新的安全地方。东南亚的山区实际就是
8 碎裂带。中国西南的云南省被称为“人类种族博物馆”就反映了其迁移的历史。只要是在国家、帝国、奴隶贸易、战争,以及自然灾害等的影响不断扩大,并迫使大量人口逃往边远地区寻求避难的地方就可以发现碎裂带,不论是亚马逊还是拉丁美洲高原(安第斯山地的高原农区和国家是个例外),以及非洲高原未被奴隶贩子进入的走廊、巴尔干和高加索。碎裂带的明显特点就是其地理上的相对难于进入和非常多样的方言和文化。

上面关于边陲地区的解释与大多数文明自我讲述的官方故事完全不同。在那些故事中,这个过程被描述为落后、幼稚,甚至可能是野蛮的人群逐步被统合到先进、高级和繁荣的社会和文化中。假使这些野蛮人是做了政治选择来保持与国家的距离,而不是被征服,那么一个新的政治形式出现了。这些尚未被统治的边陲地带的许多,甚至是大部分居民并非以往社会组成的残留,或者如东南亚一些低地民间传说所说的,是“我们的活祖先”。有意地将自己放到国家边陲的人们有时会被不恰当地称为次级原始主义。他们的生存法则、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地理上的分散,以及他们文化中的许多因素都不是人类所遗留的原始特征,而是被精心设计以阻止他们被统合进附近的国家,或者避免在他们内部产生国家一样高度集中的权力。他们的实践,也包括他们的意识形态,完全是为了逃避已有的国家和预防可能出现的国家。换句话说,他们是“国家作用的结果”(state effect)。他们是“有意的野蛮”(barbarians by design)。他们在摆脱政治上被统治的同时,还与低地的中心地区保持了繁忙和互利的贸易。

一旦我们考虑到“野蛮人”可能并非是早期存在的遗留

物,而是为了保持自主而主动选择了他们的地点、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那么社会进化的文明故事就会彻底地崩溃。历史的文明发展序列,也就是从采集到刀耕火种(或者放牧)到定居农业和灌溉稻作农业,或者与此类似的另一种序列,即从森林中的流动点到清理出来的林间空地,到小的定居点,一直到村庄和城镇,直到城市商业中心,这些假设支持了谷地国家的优越感。如果这些被想象出来的不同“阶段”事实上都只是系列社会选择的结果,代表了与国家之间特定的相对位置关系,那么情况会怎样?同时,如果在多数时间段,许多人群都策略地选择转移到所谓的“原始”状态以保持与国家的距离,情况又该如何?从这个角度看,谷地国家的文明话语,以及不久前社会进化论的理论家,只是将国家统治状态与文明、将自我治理的人民与原始状态相混淆,并由此导致了自我膨胀。

9

贯穿我这本著作始终的逻辑将从根本上颠覆上述逻辑。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山民被污名化的特征——处于边缘地带的位置,地理流动性,游耕农业,灵活的社会结构,宗教上的异质性,平等主义,甚至没有文字,以及口头文化——完全不是文明所遗留的原始印记,我们最好用长远观点把它们看作是精心设计的,可以同时逃避被国家统治和自我生成国家。换句话说,这些特征表现了无国家的人民对有国家世界的适应,有国家的世界既是诱人的,也是有威胁的。

制造臣民

直到近几个世纪之前,逃避国家一直是一个切实的选

择。在数千年前,人们都居于国家结构之外,生活在松散的帝国统治,或者各自为营的统治权力之下。¹¹现在这种选择正在迅速消失。一个关于无国家的人民与国家之间权力平衡的非常概要和简略的历史会有助于理解在过去的千年中,可供操作的空间是如何被迅速压缩的。

这个空间压缩故事的中心是国家与定居农业的永久结合。¹²在固定耕地上种植农作物受到国家的鼓励,并且历史地成为国家权力的基础。反过来定居农业也导致了土地的产权、父权制家庭企业的产生,以及同样受到国家鼓励的对大家庭的重视。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没有瘟疫和饥荒的影响,谷物种植业内在的膨胀将带来大量剩余人口,这些人必然会移动到新的地区进行殖民。从长远的角度看,谷物种植农业是“游动”和侵略性的,不断地复制自己。正像休·布罗迪(Hugh Brody)所注意到的,与“稳定的定居者”相比较,采集人和猎民更依赖单一区域,人口也更稳定。¹³

10 通过殖民主义和白种人殖民地所形成的欧洲权力的大幅度扩张代表了定居农业的扩张。在“新欧洲”(neo-Europe),如北美、澳大利亚、阿根廷,以及新西兰,欧洲人尽可能地在新的地方复制了他们所熟悉的农业。在那些已经产生建立在定居农业基础上的国家的地方,欧洲人取代了当地的领主成为新的统治者,像其前任一样,他们也同样征税和鼓励农业,只是更高效。对于其他的生存模式,除了它们提供有价值的贸易物资(比如皮毛)以外,从财政角度都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因此,采集者、猎民、轮耕的农民,以及牧民则被忽视或遗忘,或者被从可开垦的耕地赶到荒地上。然而,到18世纪末期,尽管无国家的人口在世界上已经不占优势,但他们还占据

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土地面积——林地、裸露的山地、草原、沙漠、极地、沼泽,以及难以到达的边陲地区。到现在为止,这些地区仍然是那些因各种原因逃避国家人的潜在庇护所。

总的来说,这些无国家的人很难被纳入到雇佣劳动或定居农业这样具有财政清晰性的经济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可以享受贸易的好处,却没有国家臣民的苦差、被统治和被限制流动,“文明”对他们没有任何吸引力。无国家人民的广泛反抗直接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沿岸以及东南亚创造了一个奴隶的黄金时代。¹⁴从我们这里所采用的观点来看,大量人口被强制从生产和劳动都不清晰且不可能被征用的环境下搬迁到可以种植经济作物(茶、棉花、糖、靛蓝和咖啡)的殖民地或种植园中,这将增加地主的收益和国家的财政能力。¹⁵圈地运动的第一步需要采取占领和俘获,从而可以将他们从更为自治(也更为健康!)的无国家地区迁移到可以征用其劳动力的地区。

这些巨量的圈地运动的最后两步发生在19世纪的欧洲和主要是20世纪的东南亚。在那里,国家与边陲的关系变化非常剧烈,大大超出了我这里所讲述的故事。在最后这个时期,“圈地运动”已经主要不是将人口从无国家的区域转移到国家控制区域,而是将边陲地区直接进行殖民化,将其变为可以完全控制、财政富裕的地方。其内在的逻辑,从未被彻底实现过,就是完全消除无国家的空间。依靠缩短空间距离的技术(全天候的道路、桥梁、铁路、飞机、现代武器、电报、电话,以及包括全球定位系统在内的现代信息技术),这一帝国主义计划是如此空前,其动力也不同以往,因此我这里的分析对比如说1950年以后的东南亚不再适用。现代国家政体的概念和成熟

资本主义对资源的需求共同导致了最后圈地运动的出现。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有证据表明,作为标准和完全排他的政体,民族国家对无国家的人群是充满敌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的权力在理论上就是将其垄断的强制力全部投入至其统治区域的边缘。在那里,它必然会遇到另外一个投注控制到共同的相邻边界的主权力量。理论上来说,大面积没有主权的地域或相互抵消的弱主权会消失,同时不受特定主权制约的人群也不再存在。实际上,大多数民族国家至少在它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试图实现这一图景:建立武装边防哨所、将忠于国家的人口迁移到边界地区,将“不忠于”的人搬迁或赶走,清理边疆地区的土地用于定居农业,修建到达边界的道路,将逃亡人群登记注册。

这一主权概念后接踵而来的是原来被忽略,似乎毫无用途的疆域,也就是那些无国家人被贬黜的地方,对于成熟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巨大经济价值突然被意识到了。¹⁶它们蕴藏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源——石油、铁矿石、铜、铅、木材、铀、铝矾土、航空和电子产业所需要的稀有金属,以及水电、生物勘察(bioprospecting)区域和保护区——在很多时候,上述这些资源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这些地方的白银、黄金和宝石矿藏,还有奴隶,早就引起了人们的觊觎,现在则成为新淘金潮的目标。现在有更多的理由要将国家的权力投入到这些未被统治的边缘地区,将当地居民紧紧地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

占领和控制国家的边缘地区还包含了文化政策。沿东南亚大陆国家边界分布的边缘地区所居住的人口与国家中心区域占统治地位的人口往往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很明显,他们杂乱地分散在边疆地区,产生多种不同的认同,有

些关注民族统一,有些关注民族分离。软弱的谷地国家在没有选择的时候,也会允许,或者说是容忍他们某些程度的自治。但只要可能,他们就会试图将这些人群置于他们日常的管理之下,鼓励甚至坚持使他们与国家核心区域的大多数人口保持语言、文化和宗教的结盟。在泰国,这意味鼓励拉祜(Lahu)等少数民族变成君主政体下的说泰语、识字的佛教徒。在缅甸,这意味着将克伦族(Karen)人变成效忠军政府的讲缅甸语的佛教徒。¹⁷

与经济、管理和文化上的同化政策相平行的是人口压力和自觉安排双重驱动所产生的吞噬(engulfment)政策。大量渴望土地的人口从平原迁移或被迁移到山区。他们在这里复制谷地的居住模式和定居农业,逐渐地,他们的人口超过那些分散居住并且人口稀少的山地人。1950到1960年代越南的一系列移民运动清楚地表明了强制定居和吞噬政策的结合:“游牧民定居运动”(Campaign to Sedentarize the Nomads),“固定耕作和固定居住运动”(Campaign for Fixed Cultivation and Fixed Residence),“冲击山地运动”(Storm the Hills Campaign),以及“用火炬照亮山地运动”(Clear the Hills by Torchlight Campaign)。¹⁸

这些相对自主和自治社区的减少(reduction)和标准化是一个有着长久历史渊源的文化过程,成为东南亚大陆任何一个大国历史自觉中不可或缺的主题。在越南官方的描述中,“向南方的迈进”(march to the south)——向湄公河和跨越巴塞三角洲(Bassac Deltas)——尽管看起来似乎是历史过程的描述,但却被错误地看成与国家的解放战争一样重要。¹⁹缅甸和泰国也有大量的人口迁移,即从曼德勒(Mandalay)、阿犹他

亚(Ayutthaya),以及现在的河内等北部历史上的核心地区分别向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角洲迁移。西贡(过去被称为胡志明市)、仰光、曼谷这些巨大的港口城市早期都是服务于这些曾经的边疆、三角洲和内陆地区,随着人口增加,成为统治早期内陆的首府城市。

13 广为人知的内部殖民主义恰当地描述了这一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吸收(absorption)、替代(displacement)和/或者消除原有的当地人。这个过程还包括了植物学的殖民主义,通过森林采伐、沼泽排水、灌溉和修建防洪堤,景观被改变为适合种植作物与定居,还被纳入国家和殖民主义者所熟悉的管理系统。我们只有将这个过程看作对所有地方性内容的简约化,包括地方的语言,少数民族人口,当地耕作技术,当地的土地制度,当地的狩猎、采集和林业技术,当地的宗教等,才能评价其殖民化的效果。在实施这一过程的国家官员看来,这些努力是把文明和进步带到边陲地区,而进步则表现为包括汉族、京族、缅甸人和泰人在内的占主导地位族群的语言、农业和宗教实践的侵入和繁殖。²⁰

东南亚大陆所保留的自我治理的人群和空间都在急剧减少。我们将主要集中讨论东南亚大陆的山地人群(他们经常被错误地称为部落),特别是缅甸的人。我要澄清无国家空间这样一个别扭的词汇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它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山地或高海拔地区。与集中的谷物生产相联系的国家一般都是产生于耕地面积广阔的地区。在东南亚大陆,这样的农业生态一般都分布在低海拔地区,从而使我们可以谈论“谷地国家”和“山地人群”。其他地方,比如安第斯山区,传统耕作条件下容易耕作的土地都分布在高海拔地区,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状况:

国家在山上,而无国家的空间则分布在潮湿的山下低地。所以最关键的变量不是地理高度本身,而是集中的谷物生产的可能。无国家的空间则相反,它们往往位于那些存在巨大的地理困难,因而国家很难建立和维持其权威的地方。明朝的某位皇帝在描述其王国西南省份的时候就有类似的想法:“道路漫长且危险,高山河流成为巨大的障碍,风俗习惯迥异。”²¹沼泽、泥塘、红树海岸、沙漠、火山边缘,甚至茫茫大海,像东南亚几大河流不断扩大和变化的三角洲一样具有同样的作用。这些地方是困难并难以进入的疆域,不管海拔高度如何,都阻碍了国家的统治。我们将在后面更详细地看到,这些地区经常成为那些反抗或逃离国家的人群的避难天堂。

伟大的山地王国,也叫赞米亚;或者东南亚大陆的边疆地区

世界上仍然存在的最大无国家空间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最大的,那就是被称为东南亚山地的巨大高地,近年来则被称为赞米亚。²²这一分布在东南亚大陆和中国、印度、孟加拉等国边疆的巨大山地区域延展出差不多25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作为第一批将这一山区及其人民作为单独研究对象的学者之一,让·米肖(Jean Michaud)追踪了其范围:“从北到南,它包括了四川的南部和西部,贵州和云南的全境,广西的西部和北部,广东西部,缅甸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与之接壤的印度最东部(北部)地区,泰国北部和西部,老挝位于湄公河谷之上的所有地区,沿安南山脉(Annamese

Cordillera)的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柬埔寨的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²³

粗略地计算,赞米亚仅少数民族人口就有差不多800到1000万。²⁴其人群被分成数以百计的族群,至少有5种语系,几乎无法将他们简单地进行归类。

如果不是延伸了8个民族国家,分布在海拔200或300米到4000米的赞米亚可以被看作是东南亚的阿巴拉契亚山区。也许更适当的类比是处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边缘之间的山地王国瑞士,它自身也成为—个民族国家。如果借用欧内斯特·盖尔纳论述阿特拉斯山高地(High Atlas Mountains)柏柏尔人的精辟语言来说,这一巨大的山地可以被看作“—个分布广泛的没有布谷鸟钟表的瑞士”。²⁵与山地民族国家不同,这一地带位于各国的边疆,远离它所穿过的国家主要人口中心。²⁶几乎从所有方面看,赞米亚都是边缘的地区。远离经济活动中心,横跨在8个民族国家和诸多宗教传统和宇宙观的结合带上。²⁷

历史上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着古典的国家和它们的文化核心,最近则围绕着民族国家,他们都缺少必要的工具从整体上来考察这一高原地带。已经有了一批先行者,他们认为这些不断积累的民族国家“碎片”使人们可以将之作为—个特殊区域研究,威利姆·范·申德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比其他人走得更远,专门给这个地区—个名字:赞米亚。这个词汇在印度—孟加拉—缅甸交界的区域使用藏缅语系的高地居民中是很通行的。²⁸确切地说,赞(Zo)是—个表示关系的词,意思是“遥远”的,隐含着生活在山上的意思;米(Mi)的意思是人民。在东南亚的各地,米赞(Mi-zo)或者赞米(Zo-mi)都指的是边远的山地人,与此同时,每一个特定的地理生态区位

(*niche*)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民族标志。²⁹尽管威利姆·范·申德尔将赞米亚的边界大胆地扩展到了阿富汗甚至更远,但是我将这个概念限定在从印度北部的那伽(Naga)和米赞(Mizo)山区及孟加拉吉大港山区(Chittagong Hill Tracts)一直向东延伸的山地。

如果粗略地看上一眼,赞米亚并不像一个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特殊地区。将一个地理上的区域(*geographical area*)称为一个地区(*region*)需要有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它与其邻近地区相区别。按照这样的思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可以表明,环地中海的沿海社会可以构成一个地区,因为那里有长时间和密切的商业和文化联系。³⁰比如威尼斯和伊斯坦布尔之间虽有政治和宗教的隔阂,但是它们都属于那个有明显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安东尼·雷德(Anthony Reid)更有力地表明,在航运繁忙的东南亚,巽他大陆架(Sunda Shelf)就是这样一个地区,在任何时候,这里的贸易和迁移都比地中海更容易。³¹在所有这些例子背后所蕴含的形成地区的规律就是,在现代化之前的世界,水,特别是平静的水可以把人们联系起来,而山,特别是峻峭的高山会把人分隔。直到1740年,从南安普顿(Southampton)航海到好望角比从伦敦乘驿站马车到爱丁堡所需要的时间更短。

按照这种标准,多山的赞米亚看起来似乎与地区的概念正相反,差异,而不是一致性成为这个地区的标志。在数百公里长的山区,人们可以发现远比低地河谷更多的文化差异性,表现在语言、服饰、居住方式、民族认同、经济活动,以及宗教活动等方面。赞米亚的文化差异可能并没有像四分五裂的

新几内亚那样巨大,但是其如马赛克一般复杂的民族和语言还是给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更别说那些潜在的统治者了。正像这个区域的特征一样,在这里工作的学者也是分散和相互隔绝的。³²

18 然而我要阐明,赞米亚不仅绝对有资格成为地区,而且要说明,如果不能理解赞米亚在谷地国家的形成和消亡中的作用,就不可能充分地解释谷地国家。山地与谷地的关系是辩证和共存的,表面上是对抗的,但是实际上深深地联系在一起,我相信,这是理解东南亚国家历史变迁最基础的出发点。

山地所共享的物理和社会空间使它们与人口稠密的低地中心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山地的人口比谷地更分散,文化更多样。地形地势的困难和相对的隔绝在许多世纪中促成了众多语言、方言、着装和文化习惯的“进化生成”(speciation)。谷地往往普遍种植单一的水稻,而大量森林资源和开放(open)的陡坡地都使得山地可以比谷地有更多样的生存方式。游耕(或者刀耕火种)需要更多的土地、清理开发新的耕地和有时转移住地,这在山地更为流行。

作为一般的规律,与等级和法律森严的谷地社会相比,山地的社会结构更灵活和更平等。混杂的认同、迁徙和社会流动性是许多边疆社会的共同特征。早期的殖民官员在清点他们在山地的新财产时经常对他们所看到的同一个小村庄中居住着不同人群感到不解。山地人可以讲三四种语言,有时甚至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个人和群体的族群认同就会发生变化。地方官员希望像林奈的植物分类一样将人也进行分类,但是那些人总在不断流动,不肯定居下来,这使地方官员无所适从。然而的确能使那些明显的混乱认同状态有规律可循,

那就是他们的居住地与海拔高度相关。³³正像爱德蒙·利奇最早建议的,如果不是从高空气球上看赞米亚,而是水平地看,也就是从地形学的侧切面看,就可以看到其秩序。³⁴在任何特定的景观中,特定的人群都会定居在一个狭长水平带上,开发这一特定生活带的农业经济机会。比如果雄族倾向于居住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在1000到1800米之间),种植玉米、鸦片、粟等适合这个高度的作物。如果从高空气球往下看,或者在地图上,他们像是随机分布的小斑点,那是因为他们只占据了山顶,把山腰坡地和中间的谷地留给了其他人群。

只占据山地的特定高度和位置造成了散落的居所。然而远距离的旅行、婚姻联盟、相似的生存模式和文化的连续性都促进了超越距离的强烈认同。尽管被分隔在数千公里之外,但是可以看到沿云南——泰国边境的“阿卡”(Akha)人与越南北部红河上游河段的“哈尼”(Hani)人有共同文化。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很多,远比与那些30—40公里之外的谷地居民的共同之处多。赞米亚被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地区,不是因为政治上的联合,这根本不存在。其相似的模式在于其多样的山地农业、分散的居住和迁徙,以及贫困的平均主义,与此相关,这里的妇女地位比谷地妇女地位高。³⁵

19

与相邻的低地地区不同,具代表性的赞米亚特征是其相对无国家。当然历史上这些山地曾有国家,这里的高原面积广大肥沃,有许多横跨大陆的贸易枢纽,这些都使国家的产生成为可能,南诏、景栋(Kengtung)、南(Nan)和兰纳(Lanna)是其中比较著名的。³⁶但它们是特殊的,并不普遍。公平地说,在山地有大量建设国家的计划,但很少获得成功。那些确实突破重重困难成功建立的王国,也只是在普遍危机的情

况下存在了比较短的时间。

除此之外,与谷地不同,山地既不向君主交税,也不向永久的国教缴纳固定的“十一税”。他们是由采集者和山地农民构成的相对自由的无国家人群。由于赞米亚地处低地国家中心的边缘,从而保持了相对的隔绝,以及隔绝所带来的自主。延伸于各国边界之间,身处多个国家主权的相互竞争中,赞米亚的人民可以享有许多利益,包括私运物资、走私违禁品、种植鸦片,以及“边界地区小权势”,从而保持微妙和紧张的半独立状态。³⁷

我认为更可信也更准确的对赞米亚山民政治状况的描述是他们积极地抵制被统合到古典国家、殖民国家,乃至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它们除了获得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利益以外,大部分赞米亚“都抵制了他们所从属的国家的民族认同(nation-building)和国家建设(state-making)”。³⁸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独立,赞米亚变成了分离主义运动、保护本土权利斗争和千年暴乱、地方平等主义、与低地国家武装对抗的大本营,这种抵制变得尤其显著。但是抵抗有更深层的原因。在前殖民地时期,从山地人拒绝低地的文化模式和低地人流亡到山地寻求庇护中可以看到这种抵抗。

20 在殖民时代,山地的政治和文化自治被欧洲殖民主义者所强化,对于他们来说,单独管理下的山地提供了对殖民统治心怀不满的低地大多数人的制衡。这种经典的分而治之政策的效果之一就是山民在反对殖民主义运动中作用很小或没有作用,有时甚至成为反殖民运动的对抗者。好的情况下,他们保留在民族国家的边缘地带;坏的情况下,他们成为威胁独立

的第五纵队。^[1]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独立后的低地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将其权威扩展到山地,包括军事占领、反对刀耕火种的运动、强制移民、鼓励低地居民迁移到山地,改变其宗教信仰,以及修建作为空间征服工具的道路、桥梁,架设电话线等,还有扩展政府管理范围和推广低地文化方式的发展项目。

无论如何,山地并非仅仅是政治抵制的空间,同时也是文化拒绝的区域。如果只是政治权威的原因,人们也许会期望除了地理高度和由此导致的分散居住格局以外,山地社会在文化上与谷地相似。但是山民在文化上、宗教上或语言上与谷地中心区域的居民不同。直到不久以前,欧洲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山区与平原的文化差异。在赞许地引用德·托特男爵(Baron de Tott)所说的“最陡峭的地区是自由的庇护所”的时候,费尔南·布罗代尔已经阐明了山地的政治自主。但是他的结论有些过头,他坚信平原和山地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他写道:“大山统治了另外一个与文明相分离的世界,而文明是城市和低地的成就。它们几乎没有历史,它们总处在伟大的文明浪潮的边缘,即使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文明在水平的方向上可以扩展到很远距离,但是在面对数百米垂直障碍的时候,它们是完全没有能力跨越的。”³⁹布罗代尔只是重复了14世纪阿拉伯伟大哲学家伊本·卡尔顿(Ibn Khaldun)早已有的观点,他注意到,“阿拉伯只能控制平坦的区域”,但无法跟踪躲在山上的部落。⁴⁰布罗代尔的文明不能上山的结论可以与奥立弗·沃特斯(Oliver Wolters)有关东南

[1] 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共和国后方活动的叛徒、间谍和破坏分子等反革命分子的总称,此后,“第五纵队”成为内奸或内线的代名词。——译者注

21 亚前殖民时代的相似结论做一个比较。这是转引自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的话：“大量人口生活在边远的高地，处于有历史记录的中心地区之外。曼陀罗(mandalas)[文明和权力的闹市中心]是低地特有的现象，在那些地方，地理条件支持了政府的控制(under-government)。鲍尔·惠特利所说的‘500米之外，就听不到梵文了’就是这个意思。”⁴¹

研究东南亚的学者不断吃惊于只能在很狭窄的地带内产生文化和政治影响，特别是在海拔高度上。保罗·穆斯(Paul Mus)在其有关越南的作品中回应惠特利时提到，在越南人口和文化的扩张中，“这种族群的优势在山地国家城堡的脚下就停止了”。⁴²与上述所引用的布罗代尔相似，以对中国北方边疆研究著称的欧文·拉铁摩尔也指出，印度和中国的文明在平原地区可以流传甚广，但是遇到陡峭的山地就会感到筋疲力尽：“这种同一层面的扩展，带着在低地流传甚广的古代文明的影响，远远地到达中国之外，进入到了印度支那半岛、泰国和缅甸，那里集中了农业和大城市，但是并没有达到海拔较高的地方。”⁴³

尽管赞米亚语言非常多样，但是通常来说，山地所讲的语言与平原所讲的语言区别很大。而且山地的亲属关系与低地截然不同，至少从正式制度看。爱德蒙·利奇了解这点，所以才会将山地社会的特点归纳为追随“中国模式”，而低地社会是追随“印度”或梵语(Sanskritic)的模式。⁴⁴

一般来说，山地社会与谷地社会有系统化的区别。山地人倾向于相信万物有灵论，或者在20世纪接受了基督教，他们不会追随低地人崇信救赎宗教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特别是佛教和伊斯兰教)。有时他们也会包容谷地邻居的“世界

宗教”，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却带着某种程度的异端和千年狂热，这使谷地精英感到威胁而不是放心。山地社会也有生产的剩余，但是他们没有用这些剩余去支持国王或和尚。由于缺少大规模、持久和吸收剩余的宗教和政治机构，所以在山地的社会学金字塔比谷地社会更扁平和地方化。如同谷地一样，山地社会也存在大量地位和财富的差异，但是区别在于，在谷地，这些差别是超越地方性和持久的，而在山地，这种差异是不稳定并被限定在特定区域。

山地社会的这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政治结构的差异。这种差异完全不是“族群性”所导致的，尽管有些人群，如拉祜、克木人(Khmu)、阿卡族(Akha)，看起来内部更平等和权力分散。但是也经常看到与这种特点完全不同的族群。比如克伦族、克钦族、钦族、果雄族、瑶族/绵族，以及佉族等，既有相对等级分明的亚群体，也有相对权力分散和平等的亚群体。在不同时间，等级制和集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既令人惊异也很重要。根据我的理解，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是山地社会对国家构成的模仿。也就是为了掠夺奴隶和向低地社区征收贡品而形成的短期战争联盟或是“掠夺性资本主义”(booty-capitalism)。当山地群体与谷地王国形成进贡关系的时候——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的统合或必然的从属——这可能只是控制利益丰厚的贸易通道或保障进入某些利益丰厚市场特权的权宜之计。如果从君主政体外形和言辞而言，他们的政治结构无一例外都是模仿的，但他们缺少其核心的内容：纳税的臣民、直接控制的地方机构，以及常设的军队。山地的政权形式几乎都是一样的再分配和竞争的盛宴体制(feasting system)，是和它们所能提供的利益相联系的。如

22

果它们有时表现出一些集权特征的时候,那也是像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在研究游牧社会时所说的“影子帝国”(shadow-empires),是在帝国边缘为方便垄断贸易和抢劫而生的边缘掠夺者。它们是典型的寄生者,当其所依附的帝国解体的时候,它们也同样解体。⁴⁵

逃难的地方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赞米亚并非仅仅是抵抗谷地国家的地区,而且还是逃难的地方。⁴⁶我所说的“逃难”是指大部分山民是在1500多年中来到这里以逃避谷地国家政权建设所带给他们的各种磨难。他们远不是被谷地文明进步所“遗弃”,而是经过长时间努力,自我选择了将自己置于国家的控制范围之外。如果这样来看,让·米肖已经指出,山地游牧(nomadism)可以被看作“逃避和生存的策略”,19世纪后半叶中国中部和西南地区规模空前的一系列反叛可以被看作数百万难民逃向南部边远山地的过程。他支持这种观点,从历史上看,赞米亚最好被看作逃避国家,特别是汉族国家的避免所。“公平地说,”他下结论说,“过去的500年中,从中国迁移到高地的人口,至少部分是被其强大的邻居入侵将他们从家园中推出来的,特别是汉族的扩张。”⁴⁷

23

有关汉族扩张和由此引发的移民外逃之间冲突的详细和清晰的文献从明朝早期(1368年)以后就很丰富,到了清代就更多了。因为民族和政治标识灵活多变,得到早期文献比较困难而且经常是含糊不清的。比较普遍的模式似乎是这样

的：当中国国家控制区域逐渐扩大，那些处于扩张点上的人或者被吸收（及时地变成汉族人），或者是迁移，经常是在反抗失败以后迁移。那些离开的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通过迁移实现了“自我边缘化”，从而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⁴⁸这个过程被不断重复，由逃难者组成的文化复杂的区域在国家的内地不断延伸。马思中（Fiskesjö）相信，“这个地区中各种无国家人群的历史”可以被书写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长期居住的山民（比如佤族），另一个则是努力逃亡到那里的人群：“在那些逃离（中国国家权力控制区）的人中，我们发现许多人使用藏缅语系的族群语言（拉祜族、哈尼族、阿卡族等），以及讲苗语、果雄语和其他语言的人群……他们被描述成‘带着失败的遗产’离开中国的‘山地部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失败使他们进入到现在泰国、缅甸、老挝和越南的北方，在那里，他们至今仍被称为后来者（newcomer）。”⁴⁹

在这些地区，由于处于国家直接统治之外，因此免除了税负、徭役、兵役，以及人口集中和单一作物品种所带来的瘟疫和作物歉收，这些族群有了相对的自由和安全。在那里，他们从事着我所称的逃避农业（*escape agriculture*）：为了阻止国家征收而设计出来的耕作方式。甚至其社会结构也可以被称为逃避的社会结构，因为这种社会结构被设计成有助于分散和自主，避免成为国家的附属。

山地社会中的语言和族群的多变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资源，与不断变化的认同形式相配合，从而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权利组合。赞米亚人一般来说不仅仅在语言和族群方面是多变的，而且特别愿意追随在他们之中所产生的个人魅力型领袖。他们可以产生几乎突然的社会变迁，在他们

所信奉先知的召唤下,可以放弃他们的农田和房屋,参与或形成新的社区。他们“迅速变化”的能力最能代表他们逃避的社会结构。山地居民都不识字也可以做同样的解释。事实上,在山地人的传说中,他们原来有文字,或者丢失了,或者被偷了。如果考虑到口头历史比文字历史和谱系有更强的可塑性,至少丢弃文字和书写的文本可以被看作多少是有意地适应无国家的状态。

概括地说,我认为山地人的历史最好不要被理解为古老过去的残留,而是从低地国家政权建设中“逃亡”(runaways)的历史:如果我们考察更长的历史时期,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大规模的“逃奴”(Maroon)社会。山地人的许多农业和社会实践可以被看作既能获得与低地交流的经济利益,又能实现逃亡的技术。

过去人口还比较稀少的时候,比如在东南亚地区,人口和生产被集中在单一地点就需要某些形式的非自由劳动力。所有东南亚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奴隶制国家,其中一些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东南亚在前殖民时代的战争很少是为了领土,而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得到战俘,并把他们迁移到胜利者所属领土的核心地区。这种现象很普遍,在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奴隶人口甚至超出公民的5倍。

所有这类国家政权建设计划的结果都是创造一个碎裂带或逃亡区,那些想逃避束缚的人都会逃到那里。这些逃难区构成了直接的“国家效应”(state effect)。赞米亚成为最大和最古老的逃难区,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国家超前的扩张。这类地区是强制的国家政权建设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在每个大陆都存在:它们中的一些将被作为比较案例在后面提及,这里我

仅举几个例子,以说明其普遍存在。

西班牙在新世界殖民的特征是强制劳动,这带来了土著居民的广泛逃亡,主要是去山区或干旱地区,在那里他们的生活不会受到干扰。⁵⁰语言和族群的多样性,以及有时候为了提高流动性而形成的简单社会结构和生存法则——采集和轮耕——构成了这些社会的特征。同样的过程在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被重复,据说吕宋岛北部山区几乎都是那些逃避马来人捕猎奴隶和西班牙“归化区”的低地菲律宾人。⁵¹当人们逐渐适应了山地的生态,接下来就会出现种族进化(ethnogenesis),在这之后,高地的菲律宾人就被错误地认为是在史前时期另一次迁徙到岛上的人的后代。

在俄国许多边疆地区的哥萨克人代表了另外一种引人注目的过程。他们在最初完完全全是来自俄国欧洲部分、聚居在边疆地区的逃亡农奴。⁵²在不同的地方,他们逐渐成为不同的哥萨克分支:顿河(顿河河谷)哥萨克,亚速海哥萨克等。在边疆地区,他们学习了邻居鞑靼马背上的习惯,共同使用公共开放草场,后来成为被沙皇、奥斯曼土耳其人和波兰人作为骑兵使用的“一个人群”(a people)。17世纪后期欧洲罗姆人(Roma)与辛提人(Sinti,吉卜赛人)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让人印象更为深刻的例子。⁵³与那些被污名化的流浪人群一起,他们被规定只能从事两种惩罚性的劳役,在地中海盆地是战船上的划桨奴隶,在东北部的普鲁士勃兰登堡则被强征为士兵或军队搬运工。他们聚集在一个狭长的区域内,这里逐渐以“逃亡走廊”(outlaw corridor)著称,即处于两大致命威胁的流域之间的地方。

由于早期国家政权建设都伴随着囚禁和奴役,随着奴隶

的觉醒、逃跑和形成避难所，作为劳工制度的奴隶制便创造了许多或大或小的“赞米亚”。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叙述西部非洲的高地和边缘地区，在大规模进行奴隶抓捕和贸易的500年中，有数千万奴隶被抓获从事苦役，但这个地方一直比较安全。⁵⁴ 尽管这里的地形和维持日常生活都很困难，但逃亡区域的人口仍然在不断增加。那些在非洲没有逃脱被抓获为奴隶的人，一旦他们被转运到新世界，也很快逃亡，并在所有有奴隶制的地方创造出逃奴的定居点，包括牙买加著名的高地科克皮特 (cockpit) 地区；有2万人居住的逃奴社区巴西棕榈城 (Palmares)；以及那个半球上最大的逃奴地区苏里南 (Surinam)。这还只是3个有代表性的，如果我们将那些小的“避难所”，如沼泽、湿地和河流下游的三角洲都包括进去，那么这个名单会长出许多倍。举几个小的例子，幼发拉底河下游的沼泽地 (根据萨达姆·侯赛因的法令被排干了) 作为逃避国家控制的避难所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更小的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边界上大迪斯默尔湿地 (Great Dismal Swamp)，原属于波兰、现在位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的普里佩特沼泽 (Pripet Marshes)，罗马附近的蓬提安沼泽 (Pontian Marshes) (最后被墨索里尼排干)，这些都被国家看作逃亡的地方。这类逃亡之地的名单可以很长，至少会像引起逃亡的强制劳役事件一样多。

东南亚的山地社会尽管有大量的异质性，但是仍然有很多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将他们与其谷地的邻居明显地区分开。他们形成了历史上的一种逃亡模式，因此即使不是抵抗，也是与谷地处于相对对立的位置。如果我们希望展示的是这样历史的和结构的关系，那么民族国家的框架对我们的分析

是没有意义的。对于我们希望考察的大部分时间段来说,民族国家是不存在的,即使后来民族国家参与到游戏中,大部分山地人仍然继续其跨境的生活,就像不存在国家一样。赞米亚概念是要探索一个新的“地区研究”,在这里,划定区域的理由并非基于民族国家的边界(比如老挝),也不是一个战略性概念(如东南亚),而是基于特定生态规律和结构关系,这些都会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如果我们走运的话,“赞米亚研究”的例子将可以激励其他人在其他地方追随这样的试验并不断完善。

山地和谷地的共生史

由于与世隔绝,古典低地王国的历史很可能难于理解或被严重歪曲。低地国家(曼陀罗或现代时期)总是与山地社会共生的。⁵⁵在这里,我是从生物学中借用了共生(*symbiosis*)的概念,指两个或多或少有密切关系的有机体生活在一起——在这里就是指社会有机体了。这个词并不特指,当然我也不希望特指,这种相互的依赖是不是敌对的,甚至是寄生的,或者相互之间是互利的,或协同的(*synergistic*)。

如果没有与低地中心的持续对话,我们不可能写出一部条理清楚的山地历史,同样如果忽视了其山地的边陲,也不可能写出条理清楚的低地中心历史。大体上,大多数山地社会的学者对这个辩证法都很敏感,关注两个社会之间象征性的、经济的和人群往来的深层历史。但是在低地中心区域则不同,甚至最出色的著作也没有涉及这些问题。⁵⁶这种模式并不

令人吃惊。将低地的文化和社会看作独立自足的实体(比如“泰国文化”“中国文化”)只是复制了没有反思的学术结构,在这样做的时候只是采用了低地文化精英自己所希望建立的封闭文化观。但事实是,要理解山地和谷地社会就必须把它们联系起来,我这本书正是试图如此。

如果在写作谷地人口中心的历史而不考虑山地,就像写新英格兰殖民地或大西洋中部各州的历史而不考虑美国的边疆地区一样,也像在写作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度但是完全不考虑加拿大的自由及其所具有的吸引力一样。在上述每一个例子中,外部边疆都决定、限制甚至在很多方面直接造成了中心地区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在解释低地国家的时候忽略了这个维度就不仅仅意味着“遗漏”了山地,而且也忽视了使中心之成为中心的边疆的状况和交流。

持续不断地在山地和谷地之间的往返运动,包括运动的原因、模式和结果都将深深吸引我们思考。许多谷地的人都是“前山地(ex-hill)人”,而许多山民也是“前谷地(ex-valley)人”。任何一个方向的移动都不会影响随后的运动。在某种情况下,那些已经脱离国家的群体会在以后试图隶属(或被捕获)这个或那个国家。但在一两个世纪以后,或者因为他们迁移出来,或者因为所隶属的国家自己崩溃,他们可能又在国家的掌控之外了。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种变换经常伴随着族群认同的转移。我将对所谓的东南亚大陆山地部落给出一个激进的“建构主义”解释。最好是将他们看作在过去的两千年中迁移到山地的逃亡人口,即使不完全准确,也会最接近事实。逃亡不仅发生在缅甸、泰国和暹罗国,也发生在中国,特别是在帝国扩张的唐、元、明、清时代,其武装和移民向中国

西南部推进。在山区,受到其他更强有力的难民群压迫,或者被新的国家扩张所威胁,当然也可能是自觉寻找新的土地或自治,他们会连续进行多次迁徙。他们的居住地点以及他们许多经济和文化实践都可以被看作国家作用的结果。这一图景与过去流行的假设完全不同,过去山地人被看作被那些迁移下山发展文明的人所遗弃的原始人。

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将种植水稻的谷地中心看作是山地下列方式影响的结果也是有益的。历史地来看,谷地国家不过是从公元第一个千年中期才产生的新结构。它们是由过去分散多样的人群集合而成的,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已经采取了定居的农业生产,但他们明显地不是已经建成的国家的前身。⁵⁷最早期的曼陀罗国家主要不是军事征服的机器,而是为那些有着不同来源但希望遵循他们的宗教、语言和文化形式的人提供一个文化空间。⁵⁸由于这种认同是由许多文化碎片新调制而成的,因此他们就要努力地展现自己,表现出与国家之外其他人的区别。因此,如果山地社会可以被称作国家影响的结果,那么谷地文化也可以被看作山地的影响结果。

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些词汇,比如粗糙(*crude*)、粗俗(*unrefined*)、野蛮(*barbaric*),以及在中文中的原始(*raw*),都直接指向那些生活在山地和林区的人。“林区居民”或者“山地人”只是“未开化”(uncivilized)的简称。因此,尽管在山地和谷地之间有数个世纪的人员、物资和文化的快捷往来,但是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他们之间的文化分割仍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彻底和难以改变。谷地和山地的人对他们之间的区别有着本质主义的理解,然而这与长期的历史事实是不相符的。

如何解释这一悖论?也许第一步就是要强调谷地社会与

山地社会不仅仅是共生的,而且存在于同一个时期,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对立。在早期对山地“部落”的理解和当今流行的民俗学中,他们都被看作人类历史早期阶段的遗留,也就是在发明水稻种植、学会书写、发展了文明艺术并信仰了佛教之前的我们。这些简单化(just-so)的故事把谷地文化看作先进和高水平的文明成就,是从部落制的污泥中成长起来的,然而这严重地歪曲了历史记录。谷地国家与山地人相互构成了对方的影子,既是互惠的,也是共存的。山地社会总是或者直接或者通过海上的贸易通道与谷地的帝国保持着联系。同样,谷地国家也与无国家的边缘地区保持着联系——正像德勒兹(Deleuze)与加塔利(Guattari)所说的,“存在于周围、边缘和少数族群中的地方机制肯定了与国家权力机构相对立的裂变社会(segmentary society)的权利”。事实上,这些国家“不可能独立于这种关系而存在”。⁵⁹

包括游牧民在内的移动人群与国家的关系与此完全一样。因此,皮尔·卡拉斯特令人信服地指出,所谓南美洲的美洲印第安原始社会并非是没有发明出定居农业和国家形式的古老社会,而是原来定居的农耕社会为了应对外来征服的影响而放弃了农业和定居的村庄,这些影响包括瘟疫导致的人口大幅度减少和强制的劳役。⁶⁰ 他们的移动及生存技术都是为了避免被统合进国家。格里兹诺夫(Griaznov)已经证明,在中亚草原地区大多数古老游牧民过去都是定居的农民,只是因为某些政治和人口的原因而放弃了定居农业。⁶¹ 拉铁摩尔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坚信草原游牧是在农业之后兴起的,是由那些居于草原边缘,希望“将自己与农业社区区别”的定居农民转变而来的。⁶² 与社会进化论所说的游牧

与国家是先后不同的阶段不同，国家与游牧民是双生子，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产生，尽管有时候相互之间敌对，但是却不能相互分离。

这种成对共生和相互对立的关系模式也构成了中东的历史和人类学的重要内容。在马格里布(Maghreb)，这种模式表现为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之间的结构对立。我脑中的动力学已经表现在欧内斯特·盖尔纳的经典著作《圣阿特拉斯》(*Saints of the Atlas*)中。盖尔纳也同样强调了阿特拉斯高山地区柏柏尔人的政治独立和部落主义并非是“‘前政府时期’的部落主义，而是对特定政府的政治和情感的拒绝，同时也接受了一些外部的文化和伦理”。⁶³这些部落的反抗明显是政治的，而且经过精心策划，因为他们与阿拉伯人有着同样的文化因素和伊斯兰信仰。盖尔纳指出，摩洛哥的历史直到最近还可以被写成马哈赞(makhazen，意思是有栅栏)土地与思巴(siba，意思是栅栏之外)土地的对立。思巴可以被定义为“制度性的异议”(institutional dissidence)，尽管很多时候这个词都被翻译成“无政府”(anarchy)。实际上思巴的意思是“尚未被统治的”，有着政治上自治和独立的地区，而马哈赞则意味着“被统治的”，从属于国家的。盖尔纳认为，政治上的自治是选择，而非先天的。

盖尔纳用“边际部落主义”(marginal tribalism)来强调那些可以自主选择移动或定居在栅栏之外的群体的边缘性是一种政治态度和立场：

30

这些部落人知道被统合到更集权化的国家的可能性……事实上，他们可能会在思想上或行动上反对和抵

制这种选择。阿特拉斯高地的部落就属于这种类型。直到出现了现代国家以前,他们都是异己力量,而且是自觉的……因此,“边际”部落主义……是非部落社会边缘地区存在的部落社会类型。事实上臣服的痛苦使他们愿意从政治权威中分离出来,而权力的平衡以及山地或沙漠地带的特征使分离成为可能。这样的部落主义在政治上是边缘的,知道它所拒绝的是什么。

与赞米亚一样,在马格里布,国家统治区域与自治的边缘之间的界限既是地理和生态的,也是政治的。“在高山地带,讲柏柏尔语的人与政治上的异己之间存在某些联系,因此,峡谷和山脉就成为了国家的领土(*bled el-makhazen*)和异己者领土(*bled-es-siba*)之间的界限。”⁶⁴

柏柏尔人的例子之所以富有启发意义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盖尔纳用大量资料说明了阿拉伯与柏柏尔人之间的根本分野不是来自于文明,更不是宗教,而是政治上的分界将国家的臣民和控制之外的人区别开。正像盖尔纳所假设的,围绕这个分界,历史上有很多往复的运动,然而政治地位的差别却被解释为族群的问题,似乎最根本的不同是人群类型不同,而不是政治选择的结果。这意味着,所有有理由逃避国家权力的人,不管因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将自我部落化。很明显,族群性和部落开始的地方就是统治权和税收终止的地方。在国家的辞典里,族群地区总是被害怕和污名化的,因为他们处于国家的掌控之外,并且成为那些试图逃离国家的人蔑视国家的榜样,甚至成为经常的诱惑。

盖尔纳关于柏柏尔和阿拉伯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很重要,

修正了长期以来所谓的“谷地人的观点”或“国家中心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野蛮的边缘地区”只是即将消失的过去的遗留物,或早或迟,或快或慢都会沐浴在阿拉伯文明之光下。在东南亚和马格里布,这种观点变得很可信,因为在过去的—个世纪中,越来越多未被统治的边缘地区被现代民族国家占领。但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来自谷地的观点至少有一半是错的,他们认为中心区域的辉煌和魅力吸引了许多边缘地区的人,使他们趋向一致,就像磁铁吸引铁屑—样。但是直到那个时候,还可以有国家之外的生活,而且还很吸引人。两个区域间—直是摆动的,而非单向的运动。如果这里的解释仅强调了逃避国家,这也并非是全部的事实。此外还有大量没有讲述的故事,不幸的是,在占统治地位的有关文明的叙述中并没有给这些故事以合法的位置,尽管它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简单地讲,这种共生与对立、政治选择与适当地理条件所支持的模式也适用于东南亚山地人群和谷地国家的历史关系。与马格里布—样,东南亚“统治的”与“未统治的”的区别明显是一个社会事实,这在语言使用和流行意识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根据特定的文化背景,那些成对的词汇,如“熟”和“生”的,“驯服”和“野生”的,“谷地人”与“山地人”所包含的意思与马哈赞和思巴,也就是“统治的”和“未统治的”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成为国家的臣民被理所当然地等同于被文明化,因此“臣民”和“自我管理的人民”这样的词汇表现出了其本质区别。

与中东地区—样,典型的东南亚国家也是被相对自由的社区,也就是没有国家的地区和人群所环绕。这些自治的

人不仅包括那些生活在山区的人,也包括那些生活在湿地、沼泽、红树林海岸,以及水路错综复杂的江河入海口地区的人。这些边缘人群同时也代表着谷地王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逃避国家权力人群的避难区、一个比较平等和经常迁移的地区,以及谷地国家的奴隶和臣民的来源地,同时也是与低地认同恰成对照的生态文化认同。当我们的研究兴趣集中在赞米亚高地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空间与超国家空间的关系。作为一个跨国家的巨大山区,赞米亚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对于那些逃避谷地国家政权建设的逃亡者来说,这是一个重要且复杂的流域。这个区域的居民之所以迁移到或者一直停留在这里是因为它在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外。过去对东南亚地理区域的理解往往停留在东南亚国家的边界之内,这制约了我们理解这个地区。在过去两千年中,有无数从其边界之外来的移民进入赞米亚,其中的大部分曾经是定居农民。他们(泰、瑶/绵、果雄/苗、拉祜、阿卡/哈尼)向西或南迁徙以逃避汉族,有时还有藏族的统治,或者向北方以逃避泰国和缅甸的统治。他们的地理位置是由政治、文化,或经常由军事所决定。

我进一步论证,不能孤立地理解山地人群,比如说部落。它们只能在与谷地国家的关系和相对位置中才能被理解。山地的族群特征和认同不仅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而且也包含了他们与国家权威之间相对关系的密码。我认为,除非在特定的关系中使用这个词,否则几乎不存在“部落”。同样,他们的生存实践,以及选择种植什么作物在很大程度上也都着眼于协助还是阻碍国家的征收。最后,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甚至山地的社会结构和居住方式都可以被看作针对国家权力而进

行的政治选择。我相信,东南亚平等的社会结构反映了与柏柏尔人同样的实践:“分散开,你就不会被统治。”⁶⁵从社会学和文化来看,家族世系的实践、家族谱系的推算、地方领导模式、家庭结构,甚至包括识字的程度都并非是先天的特征,而是经过有意的调整以防止(也有很少时候是协助)被统合到国家中。⁶⁶按照这些原则所做研究的有力案例需要许多求证和特殊处理。而我的大胆尝试不仅仅是为了引起讨论,更是因为这个结论比认为山地是自给自足的部落,是被文明和进步所遗留的结论更能得到证据支持。

走向无政府主义者的东南亚大陆历史

有关东南亚大陆各人群的历史是清楚的,但是国家却带来了对其的误解,包括古典的、殖民地的和独立的国家。国家中心的观点严重地歪曲了早期的历史,尽管在最近半个世纪它可能有其合理性。时期越早,被歪曲得越严重。在东南亚大部分历史时期中,谷地国家都是相对缺乏的。即使国家产生了,他们也是短命的,围绕中心的半径很小且经常变化,在这个圈子之外,国家的影响力很弱,一般都不能从大量人口中系统地榨取资源(包括人力)。实际上,统治空白时期(*interregna*)经常比有统治时期(*regna*)更长,而且,在前殖民时代,小国和领主林立的状态使得大量人口很容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改变其居住地和隶属关系,他们还会迁移到没有统治,或统治相互抵消的地方。

33

不论地点和时间,只要有大量人口的边缘地区存在,东

南亚大陆国家就会从采取优惠政策吸引臣民变为采取措施俘获他们并尽可能多地榨取谷物和劳动力。人力是个关键。甚至在那些主要依靠贸易获取王国财政收入的国家,财政收入最终也要依赖国家动员人力以保卫商路上可征税贸易点的能力。⁶⁷国家是残暴的,但也是短暂的。地理上的迁移是保证自由的基石,也是抵御国家力量的主要方式。我们在后面会更详细地考察,那些被大量兵役、劳役和税收所困扰的臣民往往会逃亡到山地或邻近的王国,而不是反抗。反复无常的战争、权利交替的争夺、谷物歉收和君主统治狂想,所有这些国家政权建设所带来的危机尽管不可预测,但迟早都会发生。

早期关于东南亚历史的争论是如何写这些国家的历史——完全没有涉及这些国家是否应被置于关注的中心。学者们对乔治·克代斯(Georges Coedès)《印度化的东南亚国家》(*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的批评就在于其忽视了东南亚中心区域有目的地借鉴和采用印度宇宙观。⁶⁸印度中心论的历史已经是歪曲的,后来又加上了欧洲中心的殖民主义历史,于是地方社会只能从“船只的甲板上、城堡的墙上、货栈的高廊中”去观察了。⁶⁹因此需要有一个东南亚“自治”的历史才可以避免这种双重的歪曲。⁷⁰但是直到最近,不管多么博学或有新意,对这种需要的回应仍然全部是东南亚国家的历史。

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国家历史会长期牢固地占据本该是当地人群历史的地方?如果概括地说,我相信原因在于国家中心是积聚并遗留了大量有形证据的政治单元,即使是那些地盘很小且持续时间很短的印度式的古典国家。作为国家核心的农业定居点也有同样的特点。也许他们

并不比采集或游耕社会更复杂,但是他们更密集和集中,灌溉水稻的种植区比采集农业地区人口密度高出100倍以上,因此他们遗留下很多集中的碎片,如贝壳兽骨堆、手工艺品、建筑材料、建筑遗迹等。⁷¹遗留碎片堆积得越大,在历史上记录中所占的分量也就越大!不论它们如何复杂和曾有什么样的贸易网络,也不论他们人口如何众多,那些比较分散、流动和平等的社会在历史记录中经常是隐性的,因为他们的那些历史碎片散布各地。⁷²

同样的逻辑会更突出地表现在文字记载中。我们关于东南亚古典国家的知识大部分来自于他们遗留在石刻和后来纸上的有关土地转让、备忘录、税收、劳役和宗教捐赠的记录,以及宫廷的编年史。⁷³你留下来的文献记录越厚,那么你在历史记录中所占的空间就越大。在文字记录中会出现多种歪曲。在传统的缅甸和泰国语中,表示历史的词是亚匝文(*yazawin*)和丰尼萨瓦单(*phonesavadan*),其意思分别是“统治者的历史”和“国王的编年史”。在这种情况下,重建非精英生活世界的结构是很困难的,即使他们就生活在中心城区。他们往往只是抽象的统计记录,如多少劳动力,多少服役兵、纳税人、水稻种植者,以及多少纳贡人。他们很少作为历史的行动者出现,而且一旦他们作为行动者出现,就像那些被镇压的暴动,肯定也是被歪曲的。你可能会觉得,农民的命运就是要待在历史档案之外。

围绕宫廷和首都城市的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还带来其他一些歪曲。它们明显是“国家空间”(state space)的历史;它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势力范围之外的“非国家的空间”和在王朝统治力下降或解体的时候所存在的漫长无国家的时段。公正地

说,在前殖民时代的东南亚国家历史中,有很多时段都是空白的。我们是否要按照官方的编年史观点,认为那些没有王朝统治的时期就是没有历史?除了遗留下很多空白之外,统治中心的官方历史系统地夸大了王朝的权力、连续性和威严。⁷⁴ 宫廷所保留下来的文献一些是税收和土地的记录,另外一些则是赞歌、权力的证明以及对合法性的诉求。后者只是意味着劝诫和扩大权力,而非报告事实。⁷⁵ 如果我们将来自宫廷中心的有关宇宙观的自夸当作有根据的事实,那么我们会冒着理查德·奥康纳所说的风险,“将几个巨大宫廷的帝国印象强加到其他地区”。⁷⁶

35 东南亚的独立民族国家使历史的迷雾又增加了新的一层。作为古典国家在族群和地理上的继承者,他们都会美化其祖先的荣耀、统治的长久和仁慈。而且,为了找到原核心国家的核心民族主义来对抗目前的敌人,国内国外都有,古典国家的历史都被审查和修改。因此,早年的工艺品,如东生铜鼓(Dong Son drums,大型的青铜制品,用于仪式活动,产生于公元前500年,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和中国南方的高地)或地方的叛乱,都被利用和称为民族或族群的成就,但这种民族认同在事件当时毫无意义。由此制造的历史神话在追溯民族及其统治人群时,掩盖了其不连续性、偶然性和不断变化的认同。⁷⁷ 正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提醒我们的,这样的解释是将国家的进程和必要性看作普遍的规律,尤其是民族国家。⁷⁸

曼陀罗式的、王朝的、首府城市和文本为基础的历史存在明显的缺陷,即使持怀疑态度阅读其价值也只在于为了利己目的所做的描述和宇宙观诉求。事实上,历史记录的大部分

时间中都没有国家,或者“很难被称为国家的国家”(hardly-a-state),特别是在山区高地。那里的国家往往只是由某个人创造的,是脆弱和分裂的,在建立者去世以后不久往往就会陷入崩溃。他们宇宙观的诉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往往比实际控制的人力和谷物的范围大很多。⁷⁹

将国家的“硬”权力与其经济和象征的影响区分开是很重要的,后者要更广泛。殖民之前的国家在向臣民征收谷物和劳动力时,其影响范围是很有限的,也就是半径300公里的范围,而且也并不稳定,并且只能在旱季。但在另外一方面,前殖民国家的经济触角却伸得很远,但这是基于自愿交换的。价值越高,而重量和体积越小的商品(可以想象丝绸、宝石与薪炭和谷物是完全不同的)越可以到达更远的地方。国家的象征触角——王权、头衔和服饰、宇宙论——可以到达距离很远和范围很大的地方,其观念在山地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甚至在反对谷地王国的人中也时常被运用。谷地王国只能在其想象的帝国版图中的极小部分实施其实际的权力,但是作为商品的市场,特别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商品的市场,它却可以影响到很远的地方。

我们如果用东南亚的真实历史代替“帝国的想象”会怎么样?正常情况下,东南亚漫长的历史时期是由无国家历史所主导的,在这长期的无国家状态中,间或有些临时和短暂的王朝国家产生。而当王朝国家解体时就会留下新的有关帝国的想象。在批评过度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时,安东尼·德(Anthony Day)也在这个方向上指出:“如果我们将不同人群间的动荡关系看作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在专制国家的规范下有一些小小骚乱,那么东南亚历史会是什么样?”⁸⁰

36

政治秩序的基本单元

正如德和奥康纳所主张的,也是凯斯·泰勒(Keith Taylor)实际上一直长期努力追求的,我们放弃宫廷国家的管道式视野,转而试图解释东南亚大陆政治秩序的基本单元。⁸¹我强调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这个词是为了避免传达出在国家范围之外都是无秩序的错误印象。基于不同的地点和时间,这些单元可能是核心家庭,也可能是分散的氏族、结盟的亲属、小村寨、大村庄、小城镇及其直接控制的腹地,以及这些城镇联盟。联盟是所有稳定存在的组合中最复杂的。它们可由水稻种植区人口密集的小城镇与邻近山区的人口组成。大量独立分散的水稻种植区的联合也很普遍,尽管它们同样存在时间很短,而且其成员也不会放弃他们的行动自由。这种联合模式可以从整个区域所保留的地名中看出来,比如云南的西双版纳(“12个水稻种植村”),越南老挝边界的四普松楚台(Sipsong Chutai, 12个泰族贵族)、马来西亚西部的森美兰(Negri Sembilan, 9个王国)、缅甸掸邦的寇米欧(Ko Myo, 9个城镇)。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地区最大的半永久单元就是马来西亚的尼格瑞/尼格拉(*negeri/Negara*),泰国的芒(*muang*)和缅甸的迈(*mainṭay*),每一个都代表了潜在的人力和粮食储备,最好的位于富裕的通商道路上。

将这些潜在的权力节点集合成为一个政治和军事联盟本身就是国家政权的一个不大且容易消失的奇迹。将大量的此类单元集中在集权统治之下是困难,而且短命的。如果它所代表的政治联合机制解体,那么他们就会分解为组成联盟

的单元：小国、小村、小居民点和宗族。旧的联盟解体以后，新的有野心的政治企业家所策划的新联盟可能会兴起，但他们仍然是原有的那些基本单元的短暂联盟。那些有野心的地方领袖，即便对他们统治范围之外的权力有一丁点儿关心，就会了解和观察国家政权建立时的象征和意识形态的模式。对国家的模仿——我前面称为宇宙观的自夸(cosmological bluster)——是用最基本的材料复制了中国和印度的高等形式，只是规模很小，小到了一个村庄的首领。

如果大的政治单元非常不稳定，那么基础单元也就很难长久作为建筑材料。我们要把这些单元自身看作是不断运动的：消失，分裂，易地，合并，重组。一个小村或宗族中的单个家庭和个人是随着时间变动的。一个居民点可能存在超过半个世纪，但是由于居民不断搬进或搬出，因此他们的语言和民族认同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⁸²在这里，人口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在1600年，东南亚的人口密度是印度的1/6和中国的1/7。那些开放边陲地区的存在是国家榨取的自动闸。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包括瘟疫、饥荒、赋税、劳役、征兵、派系冲突、教派分裂、耻辱、丑闻，以及改变运气的愿望等，一个家庭或村庄经常很容易地搬迁。正像这些基本单元自身的存在一样，随时间推移，其成员也是流动的。如果有任何的稳定因素，那就是一个地方的生态和地理条件都要适合人类居住。靠近可以通航的河道或商道，具有良好灌溉条件的平原地区可能被暂时放弃，但是一旦条件允许，又会有人重新居住。这些地方都是尼格瑞、芒和迈人的典型核心区。

尽管是流动的，但这些基本单元仍然是未来国家建设者可使用的唯一建筑材料。当缺少具有野心的强人，或者大的

政体处于散乱状态的时候，“留下来的”就是那些基本单元。在这样的背景下，可能存在清晰明了的历史吗？我相信这就是历史，尽管肯定不是王朝的历史。上述的单元肯定有自己的历史，肯定可以看到其形成、合并和解体中的逻辑线索，也肯定可以看到相对于王朝的和现代的国家自主性。他们有自己的历史，但是在不同于国家和王朝历史的轨迹上。成功王朝是稀少和短暂的，因此具有流动性的单元反而构成了其景观中相对持久的特征。“国家”是偶发的，我们与其将国家看作一个单元，不如看作“依契约关联的复杂网络”。⁸³正像阿钦·罗宾哈德纳(Akin Rabibhadana)所观察的19世纪早期的暹罗国家，当国家出现分裂的时候，“系统的组成部分倾向于分裂出来以保证自我生存”。⁸⁴

要理解看起来在不断移动的无数小单元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无疑比王朝的历史更让人沮丧，但是前人已经在理解类似的系统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可以成为我们的向导。在东南亚，已经有许多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试图把握流动背后的逻辑。其中最著名，也最富有争议的开创性研究是爱德蒙·利奇的《高地缅甸的政治体系》。延续这一理论脉络的许多高地研究都是富有启发性的，包括有关马来世界的研究，那里有关不断变换的小国、不断迁徙的人口、向河流上游迁徙和向下游迁徙的区别、未被统治和被统治人口等。在东南亚之外我们还可以重新看中东地区的国家与无国家的游牧人的相遇。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讨论18世纪北美五大湖地区社会也是从家庭这一最基本单元开始，而村庄、部落和部落之间的联盟被看作短暂和临时的联合。⁸⁵最后我们应该回首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部书描述了不同人群组成的世

界,有些人群有国王,有些没有,他们的忠诚经常变化,联盟也不稳固,这正是敌对阵营的政治家所不断担心的问题,包括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和锡拉丘兹。而每一个城邦本身又都是一个联盟。⁸⁶

东南亚大陆非国家中心历史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提出其基本单元聚合和分散的特定条件。一位观察者简单清晰地说明了发生在国家和其自治的内地之间的类似的流动:“事实上很多时候所涉及的是像分子那么小的单元,有时他们彼此形成模糊的同盟,有时又很容易分开。甚至它们的名字都没有连贯性,也不确定。”⁸⁷如果对于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分子的流动都不容易把握,那可以想象这给王朝的官员和试图建立国家的人、殖民地官员,以及现代国家的职员所带来的困惑。国家的统治者几乎无法实施对于这样一些人的统治,他们总是处于移动中,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没有固定的地址,领袖是临时的,生存方式是易变和逃匿的,他们很少有稳定的联盟,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民族认同也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

39

这正是关键点!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群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组织都是为了逃避被统合到国家结构中而做出的策略性适应。如果国家系统中有多山的内地,比如像赞米亚这样的地方,这些适应策略就很有效。

在这里(苏门答腊),我是一个专制主义的辩护者。需要强有力的权力之手将人团聚起来,把他们集中成社会……苏门答腊大部分都是由无数小部落组成的,不属于任何一个统一的政府……现在的人就像鸟在天空飞翔一

样,习惯于四处流动,除非他们被某种权威集合和组织起来,否则就无法掌控他们。⁸⁸

上面所引的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的话表明,在19世纪早期他就已经意识到,殖民统治的前提条件就是像古典大陆国家一样的人口集中和定居农业。他需要不会逃亡的人口,其劳动力和产品是透明的,从而可以被国家征用。下面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理解在东南亚大陆创立国家空间背后的逻辑和动力。

2 国家空间

统治和征用的区域

国家空间的地理和地域阻力

把蔬菜放到篮子里，
把人口放到芒(muang)里

——泰国谚语

假如你在东南亚有着和路易十四的首相让-巴普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一样的地位。像科尔贝尔一样，你有责任设计一个繁荣的王国。背景与17世纪一样是前现代的：陆上的交通主要依靠步行、人力车和役畜，水上交通则主要依靠帆船。最后让我们设想，与科尔贝尔不一样，你从一片空白开始。你具有魔法，可以使生态、人口和地理条件都适合国家及其统治者的需要。在这种条件下，你将设计出什么？

总的来说，你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理想的“国家空间”，也就是说，一个理想的征用空间。由于国家依赖税收和租金，从而问题就变成了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统

治者以最小的代价得到大量和稳定的人力和粮食剩余？这里所说的税收和租金的内容广泛，包括食品、劳役、士兵、贡品、可交易的物资和硬币等。

41 设计的原则首先是王国的臣民在地理上要集中居住，在那些容易到达的国家核心区土地上进行耕作。这种集中在前现代国家更为必要，因为依靠牛车和马车运输的经济限制了运送粮食的距离。比如在平原地区，一队牛在走完250公里以前就会吃掉它们所驮运的同等重量的粮食。一个古代汉族的谚语大体上反映了类似的逻辑：“千里不贩粟”（415公里）。¹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核心区域的精英、工匠和专家只能由地理距离比较近的农夫来喂养。在东南亚，由于自古以来人少而土地广阔，有利于人口分散。在这样的条件下，将人力集中起来更为紧迫也更困难。因此王国的核心区域和其统治者就必须由那些被集中到附近可以控制的劳动力来保卫、维持，以及供养。

按照我们所设想的科尔贝尔的观点，水稻(*padi, sawah*)的种植最终成为国家空间的首选作物。尽管比较其他生存技术来说，种植水稻给劳动力的回报是比较低的，但是却比旧世界(Old World)任何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都高。因此，在国家核心所能到达的区域内，水稻在食品供应中被最大化。对于我们假设的科尔贝尔来说，种植水稻的可持久性和相对稳定的产量也很有利。常年流水的河流或洪消农业*(*flood-retreat agriculture*)中的淤泥给农田带来了肥料，因而一块土

* 一般是在洪泛区，每年洪水将土地淹没，当洪水退去以后，不仅土地得到灌溉，而且带来大量肥料，适合耕种。——译者注

地可以长时间地保持旺盛的生产力。最后,因为水稻种植促进了集中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的产生,所以它需要人口集中,而这恰恰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资源。²

事实上在所有地方,水稻和其他谷物构成了早期国家政权建设的基础。对于假设的科尔贝尔来说,它们之所以吸引人不仅仅在于它所带来的人口和食品的集中。从税务官员的角度看,谷物比其他作物,比如说块根作物,有着决定性的优势。首先谷物是生长在地上的,大都在差不多可以预期的同一时间成熟。税务官可以调查生长在地里的谷物,从而预先计算出来可能的产量。特别重要的是,当作物成熟的时候,军队或税务官到了现场就可以想拿走多少就拿走多少。³比较块根作物来说,谷物是便于国家掌握和征收的。与其他的食品比较,谷物比较容易运输,单位重量或体积的价值比较高,可以长时间保存,特别是在不去壳的情况下谷物很少腐坏。42 可以将一车水稻的价值和保存的时间与一车马铃薯、木薯、芒果或绿色蔬菜进行比较。如果科尔贝尔被要求从头设计理想的国家作物,他不可能找到比灌溉水稻更好的作物了。⁴

那么难怪东南亚所有前现代国家的核心都位于适合种植水稻的生态区域内。这样的生态区域越大并且越适合种植水稻,那么国家的规模就会越大,持续时间就会越长。我要强调指出,至少在殖民时代之前,国家既没有自己修建大面积水稻田,也没有在水稻田的维护中起任何作用。大量证据表明,是家族、村寨通过建设和扩大分水坝、水闸和沟渠等控制水所需要的设施逐渐改善了稻田。这些水利设施经常早于国家核心的产生,而且经常比许多国家持续的时间还长,尽管这些国家暂时受益于集中的人力和食品供应。⁵国家可以壮大自己成

为水稻种植区的核心,甚至可以扩大水稻种植区,但是却不能创造它。国家和水稻种植之间有着选择性的亲和力,但不是因果关系。

这种有选择的亲和力背后的现实政治显而易见,“对于欧洲的统治者和东南亚的掌权者来说都一样,有丰富食物支持的大量定居人口是权威和权力的关键”。⁶我们有碑文资料表明,在9到10世纪的爪哇,获得土地授权的前提条件是接受土地的人要清理树木,将轮耕和游耕的地块变成固定的灌溉稻田(萨瓦赫, *sawah*),正像东·怀斯曼·克里斯蒂(Jan Wisseman Christie)所说,其逻辑在于“萨瓦赫……可以固定人口,增加其可见度,使作物的产量相对稳定并且容易计算”。⁷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他们不遗余力地吸引和掌握大量人口在宫廷附近并要求他们种植水稻,因此在1598年和1643年缅甸国王的法令中都下令士兵必须留在宫廷附近的营盘中,而且所有不值班的皇宫警卫都要耕种自己的稻田。⁸之所以三令五申禁止离开休耕稻田,就是因为实际上事与愿违,为达到这些目标遭遇了很多抵制。只要这些目标接近实现,就会出现君主可以支配的人力和谷物的巨量“宝库”。19世纪中期爪哇玛塔兰(Mataram)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荷兰公使谈到,在距玛塔兰一天的路程之内有“难以置信的大量稻田和无数的村庄”。核心区的人力资源不仅对于食品生产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为国家的防御和扩张提供了最基本的军事力量。其数量巨大的军事力量是这类农业国家比起他们的海上竞争者所具有的决定性优势所在。

地域的冲突和摩擦为传统农业国家的势力范围设定了清晰和相对稳定的界限。正像前面所指出的,这些界限根本上

是由大规模运送食物的困难所决定的。假设是在平地道路良好的情况下,一个有效控制的国家区域可以是300公里半径的范围。19世纪晚期以前的东南亚国家政权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在于,为国家核心区的人口供应粮食受到运输路程和收成变化的限制,另一方面,人口的移动却相对容易。国家核心区的人口受制于粮食的运输距离和产量波动,同时被征召来从事粮食种植的人发现逃出国家的控制范围并不难。换句话说,牛车的缓慢和低效限制了供给国家中心可用的粮食数量,但是臣民步行离开却相对容易得多,因为前现代国家很难阻止这些迁移,这种迁移同时剥夺了国家的农民和士兵。⁹

有关前现代社会旅行和运输的统计资料提供了对水路和陆路交通的清楚比较。基于一般经验,假设是在平坦和干燥的舒适地区,大多数的估计都是平均每天24公里(15英里),一个负重36公斤(80磅)健壮的搬运工在良好的条件下也可以走差不多同样的距离。但是如果道路崎岖不平,或者天气变坏(也许两者都有),这一乐观的数据就要被大幅度减少。在前现代的东南亚,这一计算要做适当的修正,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因为他们使用的大象可以驮运货物,且适应困难的地理条件,只是大象的数量有限,没有战争能完全依靠大象。¹⁰

在困难的山地中,那些可以称之为国家的旅行与上面的数据相比要慢得多。在唐王朝统治扩大到东南亚山地时(860年)所保留下来的一份珍稀文件中,开始就是以天计的不同人口中心之间旅行时间的关键军事信息,这些人口中心是帝国控制的节点。¹¹差不多1000年后,所关注的问题仍然相同。1892年1月(旱季)海军上尉埃斯利(C. Ainslie)穿越掸邦东部的旅行就是一个代表,这次旅行是为了评价当地头领的忠

诚并调查行军路线。他的队伍包括上百名武装警察、5个欧洲人,以及大量的驮运骡子和骡夫。可能是因为道路过于狭窄,他的交通工具没有车。埃斯利在9天的旅行中考察了盘央(Pan Yang)和孟盘(Mon Pan)之间两条并行的路线。他记载了每日的困难,经过的大小河流数量,指出“在雨天,这些道路是无法通行的”。¹²每天平均的行进距离只有差不多13公里(8英里),而且每天不同,最多时候不到20公里,少的时候只有7公里。

牛车当然可以比一个背夫多负载7—10倍的货物(240—360公斤)。¹³但是背夫可以走小路,而牛车却需要比较宽的道路。在一些地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看过缅甸穷乡僻壤道路上深深车辙的人都会知道,即使道路可以通行,这样的旅行也是多么缓慢和困难。不管要走多远,牛车或者带上饲料,这就会减少有效负载;或者选择一条沿途有牧草的道路。¹⁴直到一两个世纪之前,甚至在西方,横跨大陆的大宗商品运输“都是在狭窄的道路上,有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¹⁵

人和货物流动都会遇到这些地理困难,因此就形成了内陆国家所能到达的边界。即使假设徒步每天可以走32公里,雷曼(F. K. Lehman)估计最大的前殖民地国家直径也不会超过160公里,尽管爪哇的玛塔兰要宽得多。我们可以假设一个直径240公里的王国,宫廷大体上居于中心,也就是距离边界120公里。¹⁶在中心之外的大部分地区,甚至是平原地区,国王的权力也会逐渐消失,让位于其他王国的统治或地方上的强人和匪帮。

在前现代社会,水运可能是个例外。通航的河道可以克服距离所带来的困难。风和水流可以运输陆路难以想象的大

量物资。13世纪欧洲的一项统计表明,海运的费用只是陆地运输的5%。差别非常大,因而靠近水路的王国具有重大的战略和贸易便利。大多数前殖民地时期的东南亚国家,只要面积不是太小,就可以很容易进入大海或河流。正像安东尼·雷德(Anthony Reid)所注意到的,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首都都在水路交通的枢纽处,海船在这里将货物转给内河小船,小船再去往河流的上游。权力的聚合点往往与运输和通讯的聚合点重合在一起。¹⁷

从运河的巨大经济作用中可以看到在铁路建设以前,水路交通的重要性。运河的运输也同样使用马、骡子或牛拉船,但是驳船可以减少阻力,从而可以高效地传输大量粮食。河流和海洋的运输得益于“最小摩擦力的通路”,由于地理阻力最小,从而使食品、盐、军队和人员交换的距离大大扩大。如果我们创造一个警句,那就是“容易”的水路“连接”,而“困难”的丘陵、沼泽和高山则“分隔”。

在铁路和全天候公路这些缩短距离的技术出现以前,东南亚和欧洲的陆地政体(land-bound polities)都发现如果没有水路,权力的集中和行使都非常困难。正像查尔斯·梯理(Charles Tilly)所指出的,“在19世纪后期之前,欧洲各地的陆路交通是如此昂贵,没有有效的水路交通,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担大规模军队和城市所需要的谷物和重型物资供应。供养柏林和马德里这样的内陆城市,统治者需要在其内地付出很大的努力并支付很高的成本。特殊的水路便捷无疑使荷兰在和平和战争时期都得到了极大的便利。”¹⁸

甚至到20世纪中期,在崎岖不平地区的军事行动所遇到的障碍仍然让人望而却步,最明显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1951年进军西藏。西藏代表团和中共的代表在北京签订协议以后,选择了“较快的路线”回拉萨:也就是从海路到加尔各答,乘火车并骑马穿过锡金。从锡金的甘托克到拉萨还需要走16天。在拉萨的解放军先头部队整整6个月都面临饥饿的危险,补给的3000吨大米也是通过水运,然后用骡子驮过山去的。从北方的内蒙古也运来食物,但这动员了2.6万匹骆驼,其中有一半在路上死亡或受伤。¹⁹

在标准的现代地图上,一公里就是一公里,不论地形或河流的状况怎么样,从这个角度说,现代地图是误导的。如果有平静的可以通航的水路,三四百公里远的居住点也可以有比较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而在崎岖不平的山区,甚至30公里远也不会有这么多联系。同样,交通方便的平原即使面积较大也更容易形成一致的文化和社会整体,而交通不便的山区,尽管面积小也会很困难。

如果我们需要可以表现出社会和经济交往的地图,那么我们就需要发明完全不同的地图制作尺度,也就是能够校正地形地貌差别的尺度。在19世纪中期交通运输业发生革命性变革之前,这意味着可以用人或牛车(或帆船)每日行进的距离作为单位来绘制地图。对于那些习惯于传统直线地图的人来说,这样的地图无异于从哈哈镜里出来的影像。²⁰通航的河流、海岸线和平原可以在地图上被缩小以反映旅行的容易。相反,难走的山地、沼泽、湿地和森林会被放大以反映旅行所需要的大量时间,即使直线距离很短。这样的地图从现代眼光看来是奇怪的,可作为交往、文化和交换的指南,却远比我们已经习惯使用的地图更好用。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地图有助于我们清楚地区分那些顺从于国家控制和征用的地域

(国家空间)和反抗国家控制的地域(非国家空间)。

不用长度而是用旅行时间做距离单位的地图比那些使用抽象和标准的公里或英里概念的地图更符合当地人的实践。如果你向一个东南亚农民问下一个村庄有多远,他的回答很可能是时间单位,而不是长度单位。一个很熟悉使用手表的人可能回答说“大约半个小时”,而一个不熟悉抽象时间概念的老农也许用当地的时间单位,“煮三顿米饭的时间”,或者“抽两根烟的时间”——这是所有人无需手表都明白的时间单位。在一些前殖民地时代的老地图上,任何两个地方的距离都是用从一点到另外一点旅行所需时间度量的。²¹这种方式很直观。从A到B也许只有25公里,但是由于旅行的困难程度不同,也许需要走两天,也许需要走五天,这是旅行者最想知道的。事实上,从A到B与从B到A,旅行所需时间会很不同。如果B在平原而A在高山,那么从B到A的上山路要比A到B的下山路走的时间更长,也更艰苦,虽然实际距离是一样的。

那些只能用抽象距离表现的社会、文化分区,甚至国家都可以在基于距离阻力(friction of distance)的地图中跃然纸上。这也是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世界》一书的分析中的真知灼见。维持社会运行的是没有一般意义上的“领土”或政治统治限制的活跃的货物、人员和思想的交流。²²爱德华·瓦廷·福克斯(Edward Whiting Fox)所说的古希腊爱琴海是一个小规模例子,那里在政治上从来未曾统一,但是方便的水路提供了联系和交往,这一紧密的纽带将他们连接成单一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有机体。那些时而商人,时而海盗(trading-and-raiding)的航海民族,如维京和诺曼人,依靠快速

的海上交通对远距离的地方也产生了影响。表明其历史影响的地图将大部分集中在港口城市、入海口和沿海地区。²³而它们之间的面积广大的海域则会显得很小。

49 马来世界是一个最出色的代表这种历史现象的航海世界的例子。它们的影响从太平洋东部岛屿一直延伸到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南部沿海地区。在非洲南部沿海港口使用斯瓦西里语的族群中可以看到马来的印迹。15世纪和16世纪最繁荣时候的马来国家可以被看作一个贸易港口的流动联盟,就像德国的汉萨同盟。国家的基本单位是港口,比如占碑(Jambi)、巨港(Palembang)、柔佛(Johor)、马六甲(Melaka),以及为了政治和贸易利益而在它们之间摇摆的马来贵族统治者。在这些远距离航海者的联盟面前,我们原来那些陆地的“王国”概念,也就是连成一片的国土,没有任何意义。

一个农业王国比海洋王国更加自足和独立。它只关注那些在其附近的食品和人力资源。但即使是农业王国也并非完全自给自足,他们的生存需要依赖许多直接控制区域之外的产品,包括山区和沿海的产品,如木料、矿石、牧区畜群提供的蛋白质和肥料,以及盐等。航海王国更依赖于商路提供它们所需要的东西,特别是所需要的奴隶。正因为这个原因才有可以被称为具有高度“国家性”(stateness)空间的地方,那里不需要依赖当地的谷物生产和人力。这些地方都居于战略要地,方便控制(通过税收、通行费和没收)重要的贸易产品。比如在农业产生之前,控制黑曜石(最好的石质工具所必需的)储藏的社会占据了交换和权力的有利位置。一般地说,在陆路和水路上都会有一些战略要地,控制了这些地方就可以得到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马来的通商口岸是一个经典的例

子,它们一般在河流的交汇或入海口的对面,口岸的统治者可以垄断上游(*hulu*)的出口产品,同样也可以控制内地对下游(*hilir*)的沿海和国际贸易中贸易物资的获得。在这个意义上,马六甲海峡是印度洋和中国之间贸易的咽喉要道,是建立国家政权非常有利的空间。如果说小规模的国家,那有数不清的山地王国,它们也横跨在商旅要道上,许多物资由此运送,包括盐、奴隶和茶。随着世界商贸的波动,这些王国也经历兴衰。就像马来一样,在和平时期,他们就成为“收过路费”的国家。

处于区域或海路中有利的位置只是这类情况的一部分,特别是现代,这些位置优势完全取决于交通运输、工程技术和工业上的革命:比如铁路和公路的枢纽、桥梁和隧道,以及煤矿、油田和气田的发现。

我们原来认为的国家空间就是谷物生产和人力在可管理空间的集中,这种假设过于粗糙,必须加以修正。可以缩短旅行时间的通航水路,以及由咽喉要道和战略物资所代表的权力节点的存在可以弥补附近所掌控的谷物和人力不足,但仅限于某种程度。当然,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力,那些征收过路费的国家也不能保有这些可以带来巨大利益的地点。在进行决战的时候,农业国家往往因为人多而战胜航海或占据“商贸通道”的国家。巴巴拉·安迪亚(*Babara Andaya*)在比较18世纪初越南郑氏王朝(*Trinh*, 农业国家)和柔佛(*Johore*, 航海国家)的时候强调了这一点:“柔佛是马来最有威望的国家,但是没有农业,将其与郑氏王朝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714年,荷兰人估计柔佛可能有6500人和233条各种船只投入战斗。而越南则不同,据记载,阮氏(*Nguyen*)的军队有22740

50

人,其中包括海军6400人,步兵3280人。”²⁴说明航海国家脆弱性的最早故事当然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那里,有着决心的航海国家雅典最终仍然被比它有更多农业的对手斯巴达和锡拉丘兹所打败。

绘制东南亚国家空间的地图

地理条件严重制约了前殖民时代东南亚大陆的国家政权建设。在这里,我将试图简单快速地勾画出这些主要的制约因素,及其这些因素对这类国家的所在地点、持续存在和权力行使的影响。

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是有适合耕作水稻的大面积冲积平原,这可以维持大量且集中的人口,尽管仅仅有平原还是不够的。与雅典相似,东南亚临海半岛周边巽他大陆架(Sunda Shelf)的水面平静,可以轻松地航行,从而保证了范围广大的制海权;与此不同,大陆国家只能不断与高得多的地理阻力斗争。由于这个地区的山脉和河流都是南北向的,可以发现,所有古典国家也是沿南北向河流的方向分布的。从西到东,沿伊洛瓦底江分布的缅甸古典国家,有伊洛瓦底江与亲敦江交汇处的蒲甘(Pagan)、阿瓦和曼德勒,在东部不远沿锡唐河有勃古(Pegu)、东圩(Toungoo);然后是泰国的古典国家,包括沿湄南河的大成(Ayutthaya)和很晚出现的曼谷;接下来是高棉的一些古典国家(吴哥及其继承者),
51 主要是靠近湄公河分支洞里萨湖(Tonle Sap)的吴哥王朝及其继承者;最后是河内附近沿红河地区分布的早期古典京

(Kinh)(郑氏王朝)国的核心地区。

虽然所有这些国家都在通航水路附近,但都建立在冲积平原之上。可耕作的平坦土地和常年的河流使他们可以种植水稻。引人注意的是,早期大陆国家没有一个是大河三角洲上的。在伊洛瓦底江、湄南河和湄公河的三角洲地区,只是到了20世纪早期才有大批人定居并种植水稻。这些地区一直到较晚的时候才开始发展,原因在于:1)这些地方需要大规模的排水设施才能种植水稻,2)这些地方易患疟疾(特别在刚开始进行开垦的时候),还有3)每年的洪水反复无常,且经常是毁灭性的。²⁵当然,这仅是未经澄清和证实的大胆概括。首先,如果没有距离的阻力,比如在平原、通航的河流或沿海,从这些权力中心放射出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就会如同布罗代尔所预期的那样,很容易地向外扩散。越南人断断续续地逐渐替代占人(Cham)和高棉人就是这样过程的最生动表现。扩张是沿着向南的狭长沿海地带进行的,海岸就像水上高速公路,最终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湄公河三角洲和大巴萨克地区(trans-Bassac)。

这些中心国家的经济势力范围总是大于其政治范围。当他们的政治控制受制于他们对人力动员和食品供应垄断程度的时候,其贸易范围可以到达很远的地方。距离的阻力在这里同样发挥作用。重量和体积越小,价值越高的货物越可以进行远距离贸易。珍贵的货物,如黄金、宝石、香木、稀有的药物、茶叶、青铜的锣(山上最重要显示身份的物品)将边陲与中央联系起来。这些联系是基于货物交换,而不是政治统治。在此基础上,一些贸易和交换无需大宗货物运输,就可以延伸到很大地理范围,与之相比,政治整合只能在很

小的地域内取得。

53 我只是深入地考察了东南亚大陆的主要古典国家。国家在各个不同地方形成的关键条件是同样的：有一个从事水稻耕作的潜在核心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可以形成“全方位管制的核心地区，宫廷首都位于其最中心部分”。²⁶如果说有区别也仅仅在于规模的大小。如果可种植灌溉水稻的中心区很大且连成一片，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就可能促成一个大国的兴起；如果中心区域中等大小，同样在适当的条件下，有可能促成中等规模国家的兴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国家包括一个设防的城镇，至少6000位臣民，与周边山地结成联盟，位于生产水稻的平原上，理论上至少有一个统治者。在东南亚大陆也发现分散在高海拔地区的很多适合农业的生态条件，这些生态条件也有利于形成国家，但它们经常规模很小，就像是缩微景观。这些地方大多在某个时候建立过泰族小国。这些小国也会联合成为同盟，在短时间内铸造出令人惊叹的国家，只是更为少见。不管是大国或小国，围绕水稻生产核心区域形成的国家总是偶然和短暂的。人们会像爱德蒙·利奇一样，强调“水稻田是不能移动的”，因此具有潜在的生态和人口优势，那些聪明和好运的政治企业家就会利用优势制造出新的，或者重新复活原有的国家空间。在这里，即使最成功的王朝与拿破仑式的国家也完全不同；它更像是由嵌套主权（nested sovereignties）组成的不稳定等级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之所以被联系在一起是为了可以合理分配战利品，或者是通婚结成了联盟，在必要的时候还有征讨，而征讨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对人力的控制。

我们关于是什么构成了前殖民时代缅甸的概念必须要根

据国家征收和其可控制的范围的基本原理进行调整。从有效的政治实体角度看,在强大和繁荣的王朝时代,“缅甸”主要是由水稻核心区构成的,这些区域分布在距宫廷中心步行几天就可到达的距离之内。这些水稻产区虽然不必是连成片的,但是来自中心的官员和军人必须通过商路或水路容易进入这些地方。通过什么路进入这些地区是至关重要的;收粮食或镇压叛乱区域的军队必须能在途中给自己提供给养。这意味着行军路线要穿过有足够维持军队自身所需要的谷物、役畜、车辆和补充军队人员的地区。

54

因此,沼泽、湿地,特别是山地,尽管它们可能距离宫廷中心很近,但往往都不是“缅甸政权直接管理”的一部分。²⁷除了那些可以灌溉种植水稻的高原,这些沼泽和湿地都是人口稀少的地方,而且他们混合种植多种作物(采取分散游耕的方式种植山地旱稻、块根作物,同时从事采集和狩猎),这种种植方式的收成很难评估,更不要说征用了。在定期盟誓和交换贵重物品的时期,这类地区也许会与宫廷保持进贡的联盟关系,但总的来说,他们是在宫廷官员的直接统治之外。一般的情况下,高于300米的山地就不再是“缅甸”本身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把前殖民时代的缅甸看作平地上的现象,很少离开适应灌溉的生态区域。正像布罗代尔和惠特利所说的,政治控制很容易横扫水平区域。一旦它们遭遇距离的阻力,比如急剧的高度变化,或者地形崎岖不平,以及人口分散和多种作物混合种植等等政治障碍,它就无能为力了。

在这种背景下,现代的主权概念毫无意义。与其将“缅甸”想象成一个遵循现代国家绘图规则被清晰描述的连接成片的区域,毋宁将其看作地势的一个水平切片,大多数地区只是低

于海拔300米,适合种植水稻且在宫廷控制范围之内。²⁸

57 假设我们可以做一张地图用来表现不同的潜在主权和文化影响的程度。将距离阻力的作用可视化的一种方式是你自己拿着实景地图(rigid map),在这一地图上,地理高度通过地图上的凹凸(physical relief)体现。让我们再想象,水稻生产核心区的位置充满了红色液体颜料。水稻核心区的面积越大和由此容纳的人口数量越多,那么红色颜料也就越多。再想象把地图拿起来,按照不同方向连续倾斜。那么红色颜料就会从各个不同囤积颜料的地方溢出来,首先沿着平地 and 低地的河道流淌。如果把地图倾斜的角度不断加大,由于各个平原地区的深度和高原山地高度不同,那么那些红色颜料流淌的速度也会不同。

你要倾斜多大角度才能使红色颜料到达那个特殊区域大体上代表了国家试图将其统治扩展到那个地区的困难程度。如果我们假设随着旅行距离和目的地的高度增加,红色的浓度也会逐渐变淡,那么我们就可以有个大致的近似值,表示出在这些地区政治影响和控制的削弱的程度,或者换句话说,建立直接政治控制相对成本的高低。越高的地方,红色可能越淡。如果一个地方很高且很陡峭,红色就会突然变淡。在这张以深浅红色为背景的图示上会出现多少白色的斑点取决于在宫廷周围有多少山区。在这些白色区域居住的人口,也许与宫廷中心保持了进贡的关系,但很少被直接控制。如果说政治控制在令人畏惧的高山面前突然减弱的话,文化影响也

58 同样。山地的语言、居住模式、亲属结构、民族认同和生存之道与谷地完全不同。大多数情况下,山地居民的宗教与谷地是不同的。缅甸和泰国的谷地居民大多信仰小乘佛教,而山

地居民则非常不同,多是万物有灵论的信仰者,到20世纪以后,很多人都信仰基督教。

这一张想象的、表示距离阻力的地图上的颜色可以不仅为政治整合模式,而且为文化和商业整合模式提供粗略和现成的指南。当红色颜料沿着河道和平原地区毫无阻力地迅速扩展时就会更多地看到宗教活动、地方语言和社会组织等的同质性。而在距离阻力突然增加的地方,比如遇到山脉,文化和宗教的变化就会非常突然。如果像电影慢镜头一样,地图也可以显示出一个地方人口和货物的流量,以及流动的难易程度,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反映社会和文化整合程度的指标。²⁹

与其他地图一样,我们这张想象中的地图也是为了突出那些我们希望突出的关系而模糊了其他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地图也很难表明沼泽、湿地、疟疾疫区、红树林海岸和密集植被等所带来的距离阻力。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是国家中心的“颜料罐”。它是假设的,表示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中心在最有利条件下可能的影响所及。很少有国家中心能够对其内地的实际控制达到如此程度。

不管大小,这些国家中心都不能完全独占这些疆域。每一个都是一大批相互竞争的此消彼长的政权中心中的一员。在殖民统治和现代国家使这片疆域大为简化之前,存在着让人眼花缭乱的众多国家,而且几乎都是小国。利奇的说法并不夸张,“实际上‘缅甸’每一个大的乡镇都声称在历史上曾经是‘王国’的首都,他们所宣称的王国疆域曾经很大,大得难以置信”。³⁰

我们将如何用图解的方式来表达国家中心的多元化?一种可能是利用在东南亚被经常使用的梵语词汇——曼陀罗

59 (国王们的圈子)。在那里,统治者经常声称有神圣的血统,他们的宫廷经常位于生产水稻的平原,其影响从这里传播到周边的农村。理论上,那些承认他的精神和世俗权威的小国王和首领都受其统治。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最早提出用不同照明强度的灯泡来代表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和统治力,尽管这个比喻有些过时,但是把握了曼陀罗式政治中心的两个基本特征。³¹灯泡越远越暗代表了随着距离中心越来越远,不论精神的或世俗的权力,都在逐渐减弱。灯光的漫射表明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硬”(hard)边界,即边界内是百分之百的主权,而在边界外主权完全消失。

在图 I 中,我试图描绘多元的曼陀罗系统中主权的惊人复杂性。为此,我用固定的圆来表达几个曼陀罗(尼格拉、芒、迈和卡炎[k' à yaín]),权力集中在中心,并逐渐递减到边缘的零。在这里,我们要关注地域的巨大影响。我们假设,平原就像平底锅摊出的饼。17世纪缅甸的统治者关于其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域就做出了类似的假设,一个省被想象为是圆的,统治半径是精确的100帑(*tiang*,一帑等于3¼千米),一个大镇的半径是10帑,中等镇半径是5帑,村庄是2½帑。³²读者可以想象,像沼泽或崎岖地带等这些特殊的地形是如何切碎了这些规则的圆形,而通航的河道又是如何沿着水路延长了其范围。更让人吃惊的是,这样静止不变的空间表述完全忽略了空间系统随着时间而变化:事实上“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力的中心都处于无休止的变化状态”。³³读者可以将这些中心看作光源,经历了强光闪耀、逐渐转暗,当新的光源,也就是权力点突然出现,越来越亮的时候,旧的光源就会彻底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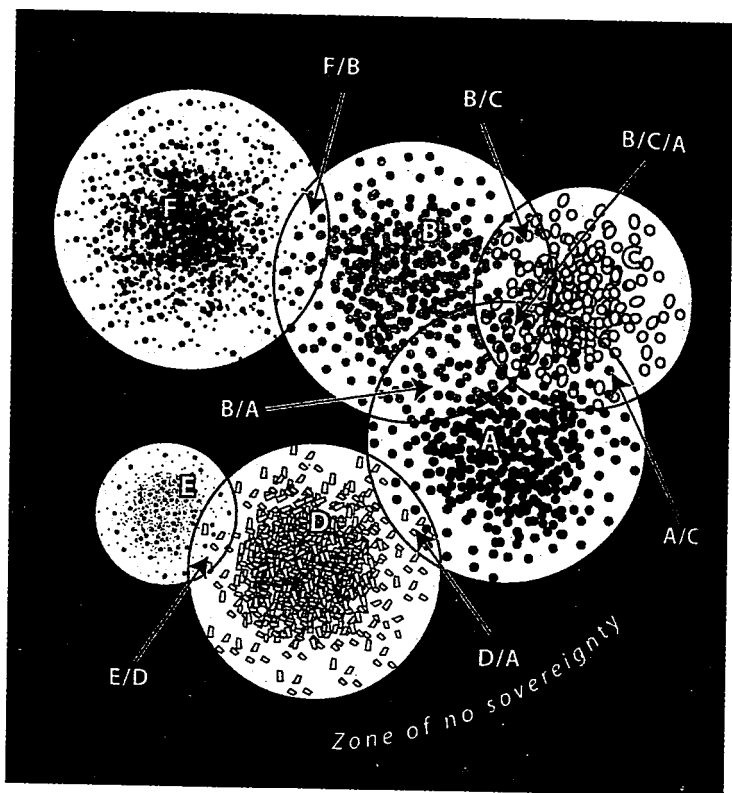
每一个圆代表了一个王国;有的小些,有的大些,但是

在越接近边缘的时候,它们的权力都在逐渐减弱,这表现为图中每一个曼陀罗里面,标记的密度逐渐减小。利用这一生动的图示仅仅在于说明前殖民时代东南亚大陆的权力、疆域和主权的复杂性,这一详细的图示是由颂差·文尼查克(Thongchai Winichakul)完成的。³⁴理论上说,曼陀罗势力范围内的地主每年都要进贡(也许他们可以互惠地得到等值或更贵重的礼物),而且当需要时,他们有义务派出军队、车辆、役畜、食物,以及其他的给养。此外,正像图示所标明的,许多地区成为多个领主的交叉领地。一旦像D/A区域那样只是在两个王国的边缘存在着双重主权,那么主权就会因相互抵消而削弱,在这个缓冲区内,地方首领及其随从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权。如果像B/A或A/C一样,王国的很大一部分都受到影响,就会出现双方中心都在这里竞相汲取,对不顺服和叛逆的村庄竞相进行惩罚性的掠夺。许多山地人群和小酋长都会策略地来管理这种两元主权的状况,他们平静地给两边的王国都进奉贡品,而且通过进贡表明自己是独立的。³⁵供奉的数量

61

从来不是倾其所有或完全拒绝那样黑白分明,无数的策略性选择是这些小国政治的最核心内容,包括进贡什么,什么时候进贡,什么时候要推迟和什么时候要扣留人力和物资。

在王国的核心区域之外,双重的和多重的主权,以及在高原地区的没有主权,是普遍和正常的。清垦(Chaing Khaeng)是靠近现在老挝、缅甸和中国的一个小镇,它同时向清迈和南(Nan)(而南又向暹罗),以及清屯/景栋(Chiang Tung/Keng Tung)(它们又向缅甸)进贡。在泰语和邻近的老挝方言中,小王国经常被定义为“在两个领主之下”,或者“三个领主之下”,而在19世纪,柬埔寨保持了与暹罗和戴南(Dai Nan,越南)的



图I 权力领域中曼陀罗的图示

进贡关系。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³⁶

20世纪民族国家普遍所有的明确而单一的主权,除了少数盛产水稻的核心区域外,在当时是基本不存在的,而这些单一主权、水稻核心区的国家很容易自己崩溃。在这些区域之外,主权是模糊、多元、多变,且经常是完全无效的。文化的、语言的和民族的联系也同样是模糊、多元和多变的。上述这些观察

再加上我们对政治权力辐射中地域和高原阻力的理解,我们可以开始明白在多大程度上有许多人口从来没有在宫廷中心的统治之下,特别是山地居民,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远离宫廷中心。

甚至最强大的王国在季风雨开始肆虐的时候也不得收缩到宫墙之内的城堡中。不管是前殖民时代的曼陀罗王国,还是殖民时代的王国,直到现在的民族国家,东南亚的国家一直随着季节而迅速变化。每年5月到10月,大陆的雨季使道路完全无法通行。传统上缅甸的军事行动都发生在11月到第二年的2月之间。3月到4月太炎热,而5月到10月后期雨水太多,都不适合打仗。³⁷在这个时候,不仅军队和税务官不可能大规模地远行,甚至旅行和贸易也减少很多,只相当于旱季的一小部分。形象地说,我们的曼陀罗地图只是显示了旱季的情况。到雨季,基于地域不同,我们不得不将每一个王国缩小到原来的1/4或1/8。³⁸当雨季来临,半年为一个周期的洪水实际上把国家孤立起来,而当雨季停止,洪水也就不再掌控国家。国家空间和非国家空间依据气候规律相互交换。14世纪一位爪哇统治者的赞美诗就已经提到统治的阶段性:“每当寒冷季节快要结束[很干燥的时候],他开始出发穿越农村……他在遥远地方展示旗帜……他表现出其宫廷的辉煌……从所有人那里接受敬意,收获供奉,访问村庄长老,查看土地登记并考察公用事业,如渡口、桥和道路。”³⁹臣民大体知道什么时候统治者会来。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军队会来,什么时候会来抓壮丁、征收军用物资和什么时候会有战争的破坏。军事战役,就像缅甸人多次入侵暹罗一样,总是在雨季结束时候开始,那时的道路可以通行,作物已经成熟。⁴⁰任何一个有关传统国家构成的考察都不得不像关心纯粹的地理一样关注天气。

殖民统治也像他们所取代的那些本土国家一样受到阻挠,尽管他们努力地修建全天候的道路和桥梁。在长期艰苦占领上缅甸的战争中,殖民军队在旱季取得的进展(多是从印度开始的)经常在雨季被重新夺回。而且雨季的疾病也是重要原因。一个关于1885年清除上缅甸敏布地区叛军和土匪的描述展现了英国军队因为雨水而被迫撤退的情况:“到8月底,整个地区的西部完全在叛军手里,除了河岸边一块狭长地带,就没有留给我们什么。在尤马(Yoma,勃古山脉)脚下的水乡泽国,是雨水和可恶的季节成全了他们……阻止了我们在年底(重新开始了旱季)之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⁴¹直到今天,当缅甸军队在沿泰国边境的陡峭山区无情地镇压敌对族群时,下雨仍然是军队经常遇到的障碍。缅甸军队典型的进攻“窗口”仍然是蒲甘和阿瓦王原来的“窗口”:11月到来年2月。直升机、前锋基地和新的通讯工具使统治者第一次可以发动雨季进攻。然而,占领缅甸最后一个克伦基地的时间是1995年1月10日,就像早年季节性战争模式曾经决定的。

63 对于那些要与国家保持距离的人来说,难于进入的山区堡垒构成了战略资源。一个有决心的国家可以发动惩罚的征讨,烧毁其房屋和地表的作物,但是它无法长时间地占领。除非有山地的盟友,否则敌对的人群只需等待雨季来临,那时供给线被切断(或者容易被切断),驻军就会面临饥饿并且撤退。⁴²因此国家作为实际的强制力量出现在遥远山区只是像插曲一般,最终会消失。这些地区为那些生活在那里,或者自己选择去那里的人提供了可靠的避难所。

3 人口和粮食的集中

64

奴隶制和灌溉水稻

我承认,[暹罗王国]的确比我的王国要大,但是你会同意,戈尔康达(Golconda [印度])国王统治的是人,而暹罗王统治的只是森林和蚊子。

——戈尔康达国王对暹罗来访者的谈话,大约1680年

作为人口集合器的国家

前现代东南亚政治权力的核心是人力的集中。这是国家的首要原则,事实上也是这个地区每一个前殖民地王国历史的祈愿。如果有广阔、平整和肥沃的耕地,而且有常年河流的灌溉,再加上离通航的河流不远,那么创建一个国家空间是不难的。追踪国家空间的普遍逻辑将有助于将人力不足而土地充足的政治体系与土地不足而人力充足的政治体系相区别,发现其本质的不同。

最简单地讲,原则是这样的:政治和军事霸权需要对集中的人力进行高度控制。反过来,也只有集中的定居农业条件下才可能有这种人力的集中,在20世纪前的东南亚,只有灌溉

水稻才可能有这种农业生态的集中。当然这些关系并非是决定论的。在河谷地带和水利条件良好的高原,稻田很容易开垦和耕作。但是在我们无法想象的陡峭高山,通过令人惊奇的梯田,也可以开垦,并且已经开垦了许多稻田,就像越南红河谷地的哈尼族、吕宋岛北部和巴厘的伊富高(Ifugao)族。同样,也有许多适合种植水稻的地方并没有开发稻田。如同我们所看到的,稻田与国家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水稻核心产区周边很容易创造出国家,但是也有没有国家的水稻核心产区,或者一些不在水稻核心产区的国家。从政治角度来看,最好是将灌溉水稻理解为最方便和常见的集中人口和食物的途径。比如,没有巨大的水稻生产核心区,人口和食物的集中就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包括奴隶制、商路上的征税,或者抢劫。

1600年时东南亚大量土地上居住的人口只有中国的七分之一,这一人口特征决定了它需要人口集中,但同时也造成了人口集中的困难。结果,当中国越来越希望控制土地而不是人口的时候,东南亚更希望控制人口而不是土地。东南亚丰富的耕地有利于游耕。游耕往往只需要很少的劳动力,但回报很高,从事游耕的家庭可以获得大量的剩余。然而有利于耕作者的特点恰恰阻碍了那些未来国家缔造者实现其野心。游耕比灌溉水稻需要更多的耕地,因而人口分散;如果游耕普及的话,“那么每平方公里的上限人口也就是20—30人”。¹集中再一次表现出其重要性。如果一个王国潜在的人力和谷物都很分散,因而集中人力和谷物很困难且昂贵,那么不管王国多么富有也没有意义。“有效的力量来自于政体的核心而非其疆域的面积和财富,”正像理查德·奥康纳已经指出的,“灌溉水稻产生强大的中心地区……它不仅支撑了密集的人

口,而且由谷物支撑的村民也容易被动员。”²泰国北部兰纳(Lanna)王国的意思是“百万稻田”,这一名字就充分反映了其对财政收入和人力的追求。

富裕的水稻耕作中心区域的条件适合所谓前现代国家理想臣民的发展。这种理想就是固定的农田上有大量密集的耕作者,每年有大量剩余的农产品。由于历代投入在稻田中的大量劳动力,他们很难带上所有东西离开这里。最重要的是,农民与他们的稻田都在空间上被固定,清晰可见,可以征税、征兵,便于控制。对于宫廷及其官员来说,好处很明显。³正是认识了这一“收获”的过程,乔治·孔多米纳(Georges Condominas)杜撰了“榷合”(emboitement,或者更好的翻译是集装箱化[containerization]或捆扎[bundling])一词来描述泰国“芒(muang)”的演化。⁴与游耕不同,“理想”的臣民是生活在“国家空间”中的被榷合者(emboîtée),也就是说经常被不可预期地索要临时增加的劳动力和粮食,在战争时期,则索要他们的生命。

66

成功的前现代东南亚国家持续不断地致力于将它所需的人口集中起来,并固定在一个地方。然而进展并不顺利。自然灾害、传染病、作物歉收、战争,更不用说还有吸引人的边疆,都时时地威胁脆弱的国家。在一千年前当中国的人口也很稀少分散、不利于国家形成的时候,一个有关统治的手册就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其危险:“如果百姓都很分散而又不能被固定下来,城市国家就会成为一堆废墟。”⁵东南亚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这类废墟。

同时存在着把他们集中起来和分散开来两种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力量,要理解这两种力量之间微妙的平衡是非常困难的。其原因有二,首先,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这种平衡是

非常多变的。一场战争或传染病，一季好的收成，一场饥荒，一条商路的消失，一个疯狂的君王，一场挑战王位的国内战争，都可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打破平衡。第二，我们要特别小心王朝的记载，甚至包括地方编年史，它们都善于王朝自我美化而拙于提供真实信息。⁶如果我们只是相信这些表面现象，就会把“国王的和平”、繁荣、宗教庇护和神圣的天意都归功于大量人口被吸引和束缚在国家核心周围。尽管我们对此表示极大的怀疑，但是这种景象也并非是完全无中生有。有许多证据表明，国王和大臣们曾经通过短期内提供种植本金、役畜和免除税费吸引人口前来定居开垦稻田。一个勃古附近的缅甸官员在1802年的年度报告中曾吹嘘说他“供养和支持了那些从边远的小镇和村庄中高高兴兴迁居来的人，那些小镇和村庄位于长满密林和蒿草的荒野上”。⁷事实上，一个和平且富裕的政权可以吸引各地尚处于游动状态，并希望获得首都地区周边的农场、工作和贸易的移民。然而王朝的历史和当代教科书的描述是对前殖民地国家的理想化，在这种描述中，受到光辉和繁荣的宫廷中心的吸引，大量至今无国家的人和和平且逐渐地集中在其周边。这种描述是种极大的歪曲。它把特例当成了规律；它无法解释前殖民时期经常出现的王国灭亡；更重要的是，它忽视了战争、奴隶制度、强迫等在创造和保持这些国家中的核心作用。如果说我忽视了一些特定的时期，在那里关于王朝繁荣的辉格党主义解释(Whiggish account)*也许还有道理的话，那是因为这些特定时期其实并

67

* 辉格党是活跃于英国17—18世纪的主要政党，19世纪转变为自由党。在这里，作者的意思是强调其自由主义的解释。——译者注

不多见,即使出现也是被故事化了,严重地歪曲了东南亚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基本特征。

如果人口数量和开放的边远地区都使单纯的强迫不能发挥作用,很明显,创造和保持国家所依赖的人口“定居密集区”(thickly-settled clumps)就需要使用武力。⁸战争和奴隶抢劫造成的人口增加经常被看作形成早期国家典型的社会等级制度和集权的起源。⁹强大的王国总在通过强制安置成千上万的战俘,或通过购买和绑架奴隶来不断补充和扩大他们的人力。就像国家权力的核心指标是其能集合的人力一样,对于那些争夺属民和奴隶的官员、贵族和宗教领袖来说,人力也同样是表明其相对地位的关键指标。从国王的许多命令中都能看到他们为保持核心人口的稳定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如果能体会言外之意,也可以体会到其中所隐含的失败。如果说18世纪大部分独裁者的政令都与逃亡的奴隶有关,由此推断农奴逃亡是普遍的问题应该不会太错。同样,国王的命令禁止臣民逃跑、更换住址和停止耕作也表明了统治者一直关注着臣民的逃亡。在大陆的许多地方,臣民被文身,有时甚至被打上烙印以表明他们的身份和主人。尽管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清楚,但是这反映了他们希望通过强制来掌握中心区域人口的努力。

在前殖民地国家机器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其对在核心区域保留和掌握人口的巨大关注。吉尔茨所说的有关巴厘岛政治竞争的话,即“他们争夺得更多的是人口而非土地”,可以被同样应用于东南亚大陆。¹⁰这个规律导致了战争活动,而战争主要不是为了控制边远的国土,而是追求可以被重新安置在中心区域的战俘。因此,战争并非特别残暴。有谁会去

68 打碎战利品呢？因为内陆农业国家特别依赖核心地区的农业生产，而不是远距离商贸的利润，所以这个逻辑就更明显。即使那些依赖抢劫和贸易的东南亚半岛国家也同样希望掌握和掠夺人力。早期的欧洲官员对于其新殖民地中国家之间和省之间边界异常模糊经常感到吃惊，而且对不受地域主权限制的人口管理感到困惑。英国的调查员詹姆士·麦卡锡（James McCarthy）“感到困惑：‘在（暹罗），习惯上管理人口和管理土地的权力是分离的’”。正像颂差富有真知灼见的著作所反映的，暹罗更关注他们所能召集的人力，而不是那些缺少劳动力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价值的土地。¹¹

对人力控制的高度关注体现在统治者的日常词汇中。泰国官员的官衔直接反映了理论上他们可以控制的人口数量：坤潘（*Kun Pan*）的意思是“千人长”；坤桑（*Kun Saen*）的意思是“十万人长”，而不是欧洲所通行的“某某地方的公爵”。¹²18世纪晚期曼谷所统治的地区按照人力多少被分成不同的等级。各个省按照曼谷对它们控制的程度从高到低排列，第四级省份意味着直接的控制，而第一级则是最弱的控制（如当时的柬埔寨）。一个省的规模是由标准化的人力总量来调整的，也就是一旦需要所能召集到的人力。那些受曼谷控制比较弱的边远省份一般人口密度比较小而面积比较大；因为理论上每一个省都应该产生同样多的人力被应征从事劳役和战争。¹³

归根到底，人力之所以最重要是因为军事考虑。即使占据了肥沃的稻作平原，或者重要的寺庙周边，以及商路上的要塞，如果不能成功地保卫也都是徒劳。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成为有关前现代政治体系中权力分析的核心问题。也许在洛